



第 13 期（总 13 期）
教学管理办公室编制

目 录

■ 新闻动态

北京大学“圆梦计划”中山学习中心 2014 级开学典礼暨表彰大会举行	4
2014 “圆梦计划”北京大学惠州班开学	5
北大参与主办“2014 年中国教育财政高峰论坛”成功举行	6
校领导与法学院教师座谈 传达学习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7
海峡两岸司法改革与法治治理高端对话在北大举行	9
“中国与世界传统、现实与未来”2014 年北京论坛在钓鱼台国宾馆隆重开幕	10
北京大学学生志愿者助力 APEC 峰会	14
残疾人议题首次列入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周	15
北大人民医院医生深入几内亚临床一线	18
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来访北大	18

■ 网教之声

北大 MOOC 课程指南：解读你的健康密码	20
慕课，一场人人受益的教育革命	22

■ 北大人物

俞孔坚：重建人与土地的真实关系	26
唐丽丽：医学不只是装在瓶子里的药	32

■ 学者谈读书

黄宗智：如何阅读学术著作和做读书笔记	38
--------------------	----

■ 好文共赏

有 7000 多种语言，就有 7000 多个“平行世界” ----- 45

■ 史苑钩沉

精神寻梦在北大：老北大边缘人的故事（四） ----- 54

■ 大美北大

北大周边小胡同（下） ----- 59

■ 学员心声

我的北大，我的梦 ----- 61

编辑寄语

同学们好，本期燕园网讯选编了北京论坛和 APEC 等相关新闻，残疾人议题首次列入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周，北大领导在论坛发表演讲；课程资源向同学们推荐：解读你的健康密码。

转眼已经到了 11 月下旬，距离期末考试只有半个月，同学们正在紧张的准备期末考试的各门课程复习。预祝同学们期末考试取得好成绩。

主办：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承办：教学管理办公室

编委会组成：

主编：关海庭、张虹

副主编：杨虎、常靖

执行副主编：王凝、杨雯宇

编委会成员：肖志欣、曾玉芬、郑鹏、杨舒婷、刘晴晴、石传芬、唐海峰、孙叶敏、王帅、王迎春、王姗姗、林以晴、高前余、张翼、吴丹、王凯惠、徐燕、张凯、赵晓玲、白永花、司敏、吴晓风、李文文

新闻动态

北京大学“圆梦计划”中山学习中心2014级开学典礼暨表彰大会举行

11月9日上午，北京大学“圆梦计划”中山学习中心2014级开学典礼暨表彰大会在中山职业技术学院报告厅举行。学院副院长何锦波、共青团中山市委员会书记丁凯、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兼副书记杨虎、广东省北京大学校友会会长徐枢、学院继续教育处副处长朱建楼出席会议。

何锦波副校长致辞，他对各位领导莅临本次大会表示感谢，向2014级“圆梦计划”新生表示热烈欢迎与祝贺，祝愿每一位有梦想的学生能早日实现人生价值。丁凯书记在致辞中寄语“圆梦计划”能通过各个高校各个部门之间的互动配合服务到更多的有梦想的社会人士，帮助其圆大学梦，为下一步人生奠定更坚实的基础。杨虎副院长在致辞中引用著名学者蔡元培、鲁迅、胡适、季羨林等学习例子向在座每一个人分享了四点学习心得：一是立志拔于流俗。二是聪明人下笨功夫。三是践行北大精神。

四是常怀感恩之心。徐枢会长在致辞中也建议“圆梦计划”的同学们先学会做“北大人”，不断鞭策自己，珍惜三年学习机会，掌握终生学习方法。

12级学生代表汪娜与14级新生代表梁碳初分别发言表示希望通过不断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来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实现自我增值。

朱建楼副处长宣读获奖名单，何锦波副校长、杨虎副院长、徐枢会长分别为获得“优秀学生奖”、“成绩优胜奖”、“优秀学生干部奖”的同学颁奖，并合影留念。

北京大学“圆梦计划”是共青团广东省委与北京大学合作共同实施的一个公益教育项目，旨在为党团组织在一线青年群体之间，尤其在庞大的新生代产业青年群体中，培养出有理想、有追求、有责任感、有影响力的“四有”新生代产业工人，以加快广东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党团青年工作基础不断储备可依靠的

骨干力量。“圆梦计划”面向全省遴选符合相关条件的新生代产业工人，资助他们进行为期 2.5 年—5 或 6 年的网络高等学历教育。

来源：北大继续教育学院

2014 “圆梦计划”北京大学惠州班开学

11 月 8 日，惠州市 200 名“圆梦计划”新学员及 100 名往届学员骨干齐聚“华基江山”音乐厅，参加开展 2014“圆梦计划·华基江山 100”北京大学惠州班开学典礼暨惠州市“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广东千名圆梦计划学员交流营开营仪式。

据悉，“圆梦计划”是由团广东省委牵头实施的惠民项目，通过省市两级财政支持和社会捐助，资助新生代产业工人完成大专、本科在职学历教育。自 2010 年 12 月实施以来，惠州已有 1410 名异地务工青年受益该项目圆了“大学梦”。今年，惠州“圆梦计划”由团市委、市圆梦办与北京大学、惠州市远智教育培训学校、知金教育惠州数字化学习中心、市广播电视大学等院校和培训机构合作实施，全市报名人数突破了 8000 人，经过资格审查确认 4095 名符合条件的异地务工青年参加了入学考

试、资格复审等多重筛选，共有 1000 人成功入围，每人将获得 4000 元资助。

在今天的开学典礼上，北京大学网络教育 2014 级新生许香代表新学员和老学员骨干发言。她表示，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迎难而上，学有所成，学以致用，做产业工人的先行者；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幸福广东的建设者，做一个感恩的人。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杨虎希望同学们有梦想、有目标，无论现实境遇如何艰难，不要放弃对梦想的挚爱，对梦想的追求并努力去实现。希望大家以季羨林先生为榜样，珍惜这次北大学业的宝贵机会，克服困难，勤奋学习，善于思考，增长才干，使自己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中取得更大的进步。

团市委书记张莉兰希望同学们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深造机会，积极克服困难和挑战，妥善处理好工作和学习之间的关系，希望大家通过学习，把个

人的成长进步与社会需要结合起来，与惠州的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把自身的发展放在整个惠州发展的大环境下谋划，在为惠州建功立业、贡献青春力量的征程中实现人生价值。

开学典礼结束后，以“奋斗的青春最美丽”为主题的“圆梦计划”学员交流营火热开营，学员们在一系列破冰游戏中迅速融入团队，现场气氛非常热烈。本次交流营为期2天。交流营采用户内户外相结合的方式，内容丰富多彩，课程安排紧凑，在课程安排上既有拓展

训练、参观叶挺故居等户外活动，也安排了观看正能量的影片《建国大业》；同时我们邀请了惠州学院中文系副主任、教授、高级记者王立祥授课《多媒体推广》，邀请了市委党校科研办公室主任、博士、副教授杨毅为大家授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还邀请了惠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黄伟辉做志愿者服务讲座以及团市委组织部长李玉璘做共青团知识讲座等等。

来源：北大继续教育学院

北大参与主办“2014年中国教育财政高峰论坛”成功举行

10月29至30日，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和中国教育发展策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举办的“2014年中国教育财政高峰论坛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年会”在北京西郊宾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政策制定者、实施者和研究者共聚一堂，围绕我国各级各类的教育财政改革体制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本次论坛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总体目标的大背景下召开，分五个专题进行研讨：（1）学前教育财政政策如何增加供给、提高质量、促进公平；（2）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新问题与新举措；（3）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中职发展定位；（4）建立高职院校的经费支持机制与助力地方产业升级；（5）高校办学自主权、特色发展与经费投入。除专题讨论外，本次论坛还围绕预算法的修改、教育财

政预决算公开制度以及后 4% 时代的教育财政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双鼓在致辞中指出，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自 2007 年成立以来，依托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在组织建设、学术交流、政策咨询和信息服务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特别是在完善中央高校预算拨款制度、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重要的政策咨询作用。

本次论坛包括财政部、教育部的相关负责人及来自全国 20 余个省市的各级教育行政系统的负责人、高校负责人、公民办中高职院校校长、企业家及研究者等共 150 余人。参会人员表示，希望在未来加强彼此的合作，为我国教育财政体制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共同努力。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歆琴

校领导与法学院教师座谈 传达学习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10 月 28 日下午，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与法学院部分教师代表在凯原



楼 307 举行了座谈，就十八届四中全会

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展开了深入的学习和讨论。会议由法学院院长张守文主持。

朱善璐首先简要介绍了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的盛况，他指出，以全会的形式研究依法治国是建党以来的首次，这意味着我国的法治建设在思想和实践领域开始进入新的阶段。他强调，这次全会具有重大意义，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为法治中国而奋斗”，无

论从思想、理念、方向、道路和目标上看都意义重大，必将对当前和今后产生深远影响。他希望法学院教师能认真学习和研究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理解全面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含义。

随后，朱善璐谈了自己对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的学习体会。他认为，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和指导性，突出了五个方面的思想。一是体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三个全面”的逻辑联系。二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体现推进各领域改革发展对提高法治水平的要求，不是就法治论法治。三是反映目前法治工作的基本格局，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个方面作出工作部署。四是坚持改革方向、问题导向，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直面法治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回应人民群众的期待，力争提出对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举措。五是立足我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朱善璐与老师们一起细读了公报的重点部分并进行了交流互动。

法学院的教师们表示，对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

国感到深受鼓舞，此次深入学习探讨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收获很大。他们普遍认为，中共中央以全会的形式鲜明地提出依法治国，显示了中央建设法治中国的决心，这对法学研究者包括北大法学院的师生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们就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关系，党的执政在宪法层面的规定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同时希望学校和学院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认真分析自身面临的各方面情况，继承传统，积极推进依法治校、依法治院，切实做好学院的教学、科研、人才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在他们的价值观构筑和输出方面加强引导，更好地维护北大声誉。

最后，朱善璐对老师们的关切给予了回应。他表示，北大法学院是国内一流的法学院，力量大，基础好，应该积极学习和深入领会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在人才培养、思想理论建设、智库建设和法治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优势，为服务国家大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进一步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对法学院也意味着新的发展机遇，希望法学院能抓住机遇有所作为，在为国家作出

贡献的同时实现自身新的发展。（文/张疆、王康宁）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歆琴

海峡两岸司法改革与法治治理高端对话在北大举行

10月24日上午9点，海峡两岸司法改革与法治治理高端对话在北大法学院凯原楼报告厅顺利举行。台湾韩忠谟教授法学基金会董事长、台湾政治大学法学院荣誉教授翁岳生，台湾韩忠谟教授法学基金会董事、台湾大学法律学院名誉教授王泽鉴，第九和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罗豪才，北大法学院院长张守文及法学院百余名师生出席了本次活动。

首先，活动开幕式主持人薛军介绍了出席本次对话的主要嘉宾，并对参加活动的师生表示欢迎。翁岳生和张守文分别致辞。

之后，翁岳生以“台湾地区大法官解释及制度对司法体制的影响”为主题发表演说。翁岳生介绍了台湾地区大法官解释制度的沿革以及变迁。北大法学院张骐、陈兴良两位教授对翁岳生的讲话进行了总结。

在第二个主题讨论“司法改革与法律教育”中，王泽鉴提出“法律教育强

则法强，法律教育弱则法弱”这一理念。他强调了法律教育和司法进行互动的重要性，并指出法律教育要成为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后，台湾朱石炎以“台湾地区司法改革与刑事制度之变迁”作主题发言。朱石炎介绍了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的改革历程，他指出司法改革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过去。之后，北大法学院梁根林教授就“在特定时间点上推动台湾刑事司法制度重大变革的原因”与朱石炎进行了交流。

本次活动于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举办，是运用法治方式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两岸交流合作的重要举措。活动提升了两岸法律学者的相互认同感，有利于大陆与台湾地区法律的协调与两岸法学界友谊的共生共长。本次活动也吸引了大批学生的积极参与和讨论。教授们在座谈会中的发言，增强了同学们对海峡两岸法律制度的了解，加深了同

学们对司法改革和法律教育的理解，促进了法律思维的碰撞。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舍予

“中国与世界：传统、现实与未来”

——2014年北京论坛在钓鱼台国宾馆隆重开幕

北京的秋天是最美丽的季节。三百余名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专家与各界领袖在秋高气爽的时节聚会北京，共论文明的和谐与繁荣。本届北京论坛的主题是“中国与世界：传统、现实与未来”，关注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历史与机遇，探讨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的中国经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为论坛发来贺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来视频致辞。

11月7日上午，北京论坛开幕式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厅举行。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国务院副秘书长江小涓，教育部副部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7届大会主席郝平，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苟仲文，北京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王恩哥等嘉宾出席开幕式。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主持开幕式。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宣读了李克强总理的贺信并致辞。李克强总理在贺信中表示，经过10年努力，“北京论坛”已成为具有影响的中外学术交流平台。今年论坛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中国与世界：传统、现实与未来”为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希望与会代表通过回顾传统、分享现实、共展未来，碰撞出更多促进不同文明交融互鉴的思想火花。李克强指出，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文明多样化深入发展，各国利益相互依存，应当相互理解和尊重对方不同的传统文化和发展现

实，和谐相处，共同发展。中国是一个拥有伟大传统和灿烂文明的古国，也是一个蓬勃向上、充满生机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愿从自身国情出发，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借鉴人类一切文明的有益成果，努力建设一个拥有高度文明的现代化中国，也为建设更加和谐繁荣的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刘延东指出，不忘传统才能开辟未来，立足时代才能焕发新生，本届北京论坛的主题“中国与世界：传统、现实与未来”聚焦中国、放眼世界，对中国与世界的和谐发展极有意义。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中国与世界多元文明和平交流的历史，中国始终秉持和而不同、亲仁善邻的理念，推进文明之间的相互尊重与多元交流。当代中国综合国力与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但中国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

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因此中国将始终秉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与世界各国一同打造普惠经济带，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为世界的和谐繁荣作贡献。北京论坛作为中国与世界对话的高水平学术论坛，汇集了全球的一流学者，为文明的平等对话搭建了有效平台，对促进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有着重要意义。

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约瑟夫·里德带来了潘基文秘书长的视频致辞。潘基文在致辞中祝贺北京论坛圆满开幕，肯定了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减贫工作为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的突出贡献。2015年联合国将组织全球对话，与各国代表共同探讨全球发展战略，努力达成新的气候协议，为消除暴力、贫困与不公正待遇而携手努力。约瑟夫·里德说，北京大学与联合国有着悠久深厚的合作历史。世界众多古老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能够经久不衰、生生不息的文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尤其重要。当今世界仍然面临着各种危险与挑战，比如今年的埃博拉疫情和 ISIS 恐怖组织活动。他希望所有的政策制定者、学者与人民共同努力，团结人类的力量去制止危机，应对挑战。

北大校长王恩哥代表北京大学和北京论坛学术委员会对与会嘉宾的光临表示欢迎。王恩哥说，十年来，北京论坛所提倡的“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得到了世界的广泛认可，文明的多样化已成为当今时代的基本现状与发展大势，也是北京论坛持之以恒的关怀。中国的发展需要借鉴其他国家和其他文明的历史发展经验，中国的发展经验也值得分享，北京论坛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交流与对话的平台。北京论坛以问题为导向，致力于在全球参与与跨学科的视野下寻求发展方案的思路，以及将中国国内和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前沿问题纳入讨论的议题设置，也为中国和国际社会应对挑战提供更有效的思路和新的方法。



在主旨演讲环节，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Robert E. Lucas，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教授王赓武，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 Nicholas B. Dirks，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分别发表演

讲。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主持该环节。

Robert E. Lucas 提供了图表和数据说明全球和部分国家的经济变化状况，分析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形势。他认为，各国经济的发展有先后之分，因此国家之间的贫富差异是正常的。只要发展条件成熟，国家间的差异也可以为后发国家开展经济建设提供动力。他同时提出，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中还要关心具体的财富分配，减少国家财富总量增加但人民内部贫富悬殊这类情况的发生。此外，他还认为不能以经济发展水平为标准判断一国是否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一国经济的繁荣大多数时候为周边国家乃至全世界提供了更多的合作机会与发展平台。

王赓武发表了题为“文明无国界：以史为镜”的主旨演讲，他以中国的传统哲学结构为例，探讨了中国文化对于当代世界和谐发展的启示。王赓武首先介绍了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指出以亨廷顿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学界将中国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作为与西方文明同等距离的两个对立面的观点有所偏颇。他认为，不同于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不仅没有所谓的一神信仰，而且对儒家经典之外的诸子学说也

相当的重视。因此，中国的信仰结构与知识体系有着开放包容的特点。这一特点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为多元文明的和谐与繁荣提供极有价值的参考与借鉴。

Nicholas B. Dirks 说，二战后美国地位的迅速提升，美国的精神也更加开放，开始接受其他地区的价值观，并开展相应的地域文化和全球化的研究。目前，全球化研究集中于经济、技术和人类面对的共同难题等领域，但对历史人文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相当滞后。历史和文化都不是机械化的，始终处在新环境中。我们必将看到世界多元文化在历史和当代的互动，全球的学者和政商界人士应努力创新政治经济理论，培育跨国治理机制，在未来抓住发展机遇，应对全球挑战。

楼宇烈认为，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之根，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强调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以人的道德、自觉与自律来维系社会。中国的人本主义对西方的人文主义发展有

极大影响，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再到启蒙运动，欧洲人文主义正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一项重要贡献。此外，以人为本还意味着自然无为，不听从天地等外在力量，做到求诸于内，以德为本。当今世界大小战争不断，我们需要继续高举人文主义的大旗，既不做神的奴隶，也不能做天地万物的主宰。他呼吁要正确阐释与弘扬中国以人为本的精神，将之传播给世界，这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任务。

本次北京论坛为期三天，将举办九场分论坛和两个专场，分别探讨国际关系、国家治理、汉学研究、新型城镇化等议题。（靳戈，程梦稷，陈圆圆，赵丹）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舍予

北京大学学生志愿者助力 APEC 峰会

2014 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周已于 11 月 5 日启幕。作为继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国庆 60 周年之后的又一项国家盛事，中共中央以及北京市委都对此极为重视。为了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以及配合北京市各机构的工作，按照学校领导对该项工作的批示精神，北京大学共组织了 122 名场内志愿者以及 200 名场外志愿者参加 APEC 会议的志愿服务工作。

9 月 20 日，校团委在 BBS、微信平台等渠道发布 APEC 场内志愿者招募信息。在之后的短短 4 天内收到近 400 名学生的志愿服务申请表。经过数轮选拔，7 名财政部长会议志愿者以及 115 名 APEC 领导人会议周志愿者脱颖而出。与此同时，校团委还通过各院系的推荐和遴选，共选出 200 名同学担任 11 月 10 日 APEC 晚宴迎宾活动的场外志愿者。北大学生对 APEC 志愿者招募反应积极，展现了北大学生热衷公益活动，乐于志愿服务，积极服务国家大事的青春热情。

从 10 月 10 日起，场内志愿者培训正式开始。对于志愿者来说，即使课程压力大、精力有限，他们仍旧坚持以最饱满的状态学习志愿服务的技巧与方

法。志愿者除了在培训课堂上认真听讲、做好记录，课后还虚心请教导师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如何更好更礼貌地处理突发状况等问题，用心提升自身各方面的能力，致力于让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专业的志愿者。在场内志愿者辛苦参加培训的同时，200 名场外志愿者也不甘落后，在参加了 10 月 11 日的第一次培训之后，校团委组织了多次校内演练，组委会也对北京大学志愿者的认真训练给予了表扬。

在经过了短暂的一周培训之后，7 名财政部长会议志愿者于 10 月 18 日正式上岗，在为期 5 天的会议中志愿者们时刻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得到了组委会和参会人员的肯定。其余志愿者在校团委的组织下开始了工作及活动的模拟



演练。场内志愿者分别于 10 月 21 日、11 月 3 日在雁栖湖新闻中心进行了两次模拟演练；场外志愿者则于 10 月 26 日、31 日及 11 月 4 日在水立方进行了三次全市合排。志愿者的演练时间经常是学生们的在校课程最为集中的时候。志愿者们克服重重困难，在繁重的课业压力之下，依然抽出时间认真参与其中。一些

志愿者还在用餐时间摆放具有北大特色的桌签，呼吁就餐的学生支持“光盘行动”、节约粮食。志愿之心，甘于默默贡献，不计回报。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舍予

残疾人议题首次列入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周

北大领导在主题论坛发表演讲

11 月 10 日，亚太经合组织（简称 APEC）第 22 次领导人会议周期间，残疾人主题活动在北京会议中心隆重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印度尼西亚总统夫人伊莉娅娜、加拿大总理夫人劳琳、日本首相夫人安倍昭惠、马来西亚总理夫人罗斯玛赫、新西兰总理夫人布罗娜、新加坡总理夫人何晶、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夫人琳达、泰国总理夫人娜拉蓬，国务委员王勇及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计生委等有关国家部委领导出席本次残疾人主题活动。

这是残疾人议题首次列入 APEC 领导人会议周，对于向世界展示中国残疾

人事业发展成果、提升 APEC 各经济体成员对残疾人问题的关注、促进残疾人议题尽快纳入 APEC 正式会议议程具有深远意义，也表达了亚太经济体希望加强残疾人事务国际合作的共同愿望。会上发布了由 21 个亚太经济体一致通过的《促进残疾人平等参与和融合发展的联合倡议》，成为各方为促进亚太地区残



疾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而达成的“北京共识”。

残疾人主题活动以“促进残疾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为主题。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和北京大学主办，中国残联国际部、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联合承办残疾人主题活动“促进残疾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论坛”，APEC 生命科学创新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郑晓瑛教授担任论坛主席。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张海迪女士致开幕辞。北京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王恩哥出席论坛并发表“教育促进残疾人发展”主题演讲。

王恩哥在“教育促进残疾人发展”的主题演讲中，认为教育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教育对残疾人发展和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强调在为残疾人提供优质教育的同时，需要通过教育提高尊重残疾人权利的公众意识及改善社会为残疾人服务的能力。王恩哥指出，高等教育对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政治和社会经济活动至关重要，北京大学以人口研究所作为开展残疾与发展项目研究的主要阵地，与中国残联紧密合作，致力于残疾人教育和发展，取得了重要的国内外影响。王恩哥希望 APEC 各经济体能够共同努力，为

残疾人提供优质教育，使每个残疾人都有机会发挥潜能，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并指出 APEC 会议期间宣布成立的北京大学 APEC 健康科学研究院，在亚太地区又增加了一个高水平的残疾研究和教学平台。

主要国际残疾人组织代表、亚太经济体负责残疾人事务代表、部分亚太经济体驻华使馆代表、亚太经社会代表、联合国系统等国际组织代表围绕残疾人生存与发展，特别是教育、就业、无障碍建设、康复以及残疾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展开研讨。论坛中，中国及国际残疾人事务代表互相分享残疾人事业发展经验、探讨发展思路 and 方向，为亚太地区社会迅速发展背景下的残疾人社会融合、共享发展成果等现实议题及对应措施建言献策，促进亚太经济体持续关注残疾人问题、扩大残疾人社会发展融合的沟通和合作。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代表 AlarcosCieza 女士提出残疾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普遍问题，所以希望把关注残疾人事业的讨论常态化。为此，WHO 根据 2011 年《世界残疾报告》，制定了“世界卫生组织 2014-2021 年全球残疾问题行动计划：改善残疾人的健康”，AlarcosCieza 女士强调这是 WHO 历史性

地将残疾问题提升为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侧重于改善残疾人的健康、功能和福祉，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残疾人事业更高的重视。

康复国际主席 Jan A. Monsbakken 先生、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先生、亚太经社会残疾人事务代表 Aiko Akiyama 女士、美国国际残疾人权利特别顾问 Judith E. Heumann 女士、菲律宾国家残疾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 Carmen Reyes Zubiaga 女士、秘鲁 APEC 事务部副主任 Carmen Azurin Araujo 女士在论坛间发表了主题演讲，分别从社会性别视角、就业、互联网科技和电子商务及无障碍环境建设等方面探讨了残疾人在共享经济社会成果、融合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介绍了美国、菲律宾和秘鲁在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方面的经验。

此次“促进残疾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论坛促进了 APEC 各经济体高层政府和学界的紧密合作，推动了残疾人融合发展的政府沟通和学术交流，是北京大学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就“促进残疾人发展”主题的深化合作。

残疾人事业正逐渐步入全球化经济发展的大框架，通过本次残疾人主题活动，亚太经济体将更加关注残疾人的生存和发展，努力创造无障碍环境，促进残疾人平等、参与、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在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APEC 生命科学创新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郑晓瑛教授和 APEC 生命科学创新委员会秘书长 Kate Clemans 等积极推动下，APEC 会议期间宣布成立北京大学 APEC 健康科学研究院，将推动高校的人口健康和残疾研究的发展和教学平台的建设，进一步推动残疾人教育、融合发展的政府沟通和学术交流，将成为 APEC 成员人口健康与残疾等领域的示范研究合作中心和高层次智库。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拉丁

北大人民医院医生深入几内亚临床一线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曹宝平与专家组协助中国驻几内亚医疗队深入临床一线，参与中几友好医院的会诊工作。通过深入中几医院临床工作第一线，专家组得到了该院目前临床工作现状和埃博拉出血热防控措施的第一手资料。

谈到目前几内亚抗击埃博拉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曹宝平表示，目前当地救治中心收容能力和救治条件极其有限。因此，需要继续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扩大收容能力、提高救治水平、扩充团队人员配备并确保及时有效地追踪与患者密切接触者。

此外，曹宝平和专家组还与医疗队共同编写《几内亚疟疾防控知识问答手册（中文版）》、协助医疗队充实更新原《几内亚华人埃博拉防控手册》、到世界卫生组织应对埃博拉暴发亚地区合

作中心（Sub-regional Ebola Outbreak Coordination Centre, SEOCC）驻几内亚办事处了解疫情等。

10月26日下午，中国驻几内亚大使卞建强在使馆接见了专家组成员和医疗队全体人员。卞建强认真听取了医疗队和专家组的工作汇报和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肯定了他们所做的工作，认为医疗队的坚守就是对几内亚的最大支持，强调了国家派遣专家组援助几内亚抗击埃博拉的政治意义。随后贾参赞宣读了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致全体援助西非和在西非工作人员的慰问信，全体人员决心以饱满的工作热情、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科学的工作方式坚守各自的岗位，帮助几内亚人民打赢这场抗击埃博拉的硬仗，不辱国家使命。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未天

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来访北大

10月28日下午，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让-克里斯托夫·冈巴德利斯（Jean-Christophe Cambadélis）一行到北大访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八局

副局长张建国，学校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副校长李岩松，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李寒梅、教授许振洲，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主任董强，国际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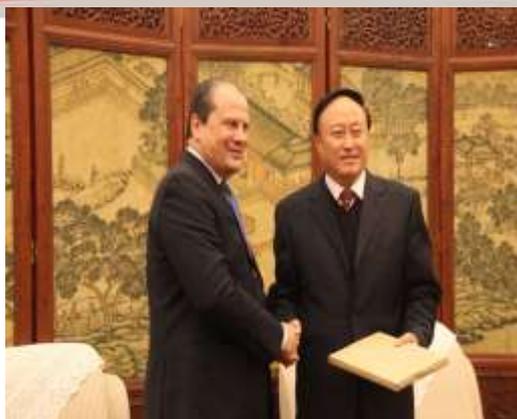
部副部长郑如青等在临湖轩中厅接待来宾，并就中法关系以及北大与法国高校的合作等相关事宜进行交流。

朱善璐首先对来宾表示了热烈欢迎。他指出，2014年是中法两国关系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习近平总书记三月访问法国极大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同时，朱善璐以自身访问法国大学的经历为例，指出大学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中法大学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尤其是科技合作与学生交流，对于发展两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冈巴德利斯对北大的热情接待表示了感谢，同时对加强两国大学合作的必要性给予了肯定。他指出，法中大学可以通过学科合作尤其是科学技术方面的交流来加强大学之间的合作关系。

会谈结束后，冈巴德利斯前往第二教学楼发表了题为“中欧如何共同打造‘和平伙伴关系’”的专题报告。该报告由张建国致开幕词，国际关系学院宋伟教授主持。

冈巴德利斯的专题报告分为三个主题：世界现状、中欧与中法关系现状和中法共同未来的描绘。冈巴德利斯首先



指出全球化应该是普世的和谐、团结和尊重，建设一个有活力的多极世界需要强大的欧洲和中国的参与，而中国也应该善用其两大优势——千年传统和当下行动的意愿。同时，他提到了法中面临的几个共同挑战，包括生态问题、贸易问题和地缘政治问题。此外法中应加强人文合作，法国愿意提供技术转让以支持中国发展。最后，冈巴德利斯表示法中应加强高水平的战略合作，并支持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文/潘冠维）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网教之声

北大 MOOC 课程指南：解读你的健康密码

一到春秋时分季节变换就感冒发烧学习好艰难？作为一个吃货却不知道怎样让食物搭配一加一大于二？妈妈情绪变化喜怒无常应该如何安慰她？今天慕小编要为大家隆重介绍几门今年秋季开的医学类精品课程，从更年期综合管理到身边的营养学，从流行病学基础到软件包在流行病研究中的应用，用生动诙谐的方式阐述医学枯燥深奥的知识，暖暖的很贴心的。

1 更年期综合管理

开课时间：2014 年 9 月 15 日

任课老师：白文佩 (Wenpei Bai) 等

开课学院：医学部

开课人数：大于 748 人选课

课程直通车：
<https://www.edx.org/course/pekingx/pekingx-18001001x-geng-nian-qi-zong-he-3081#.VDjfkfmSzp8>

嫌弃更年期妇女的喜怒无常？她可能正遭受着心理和生理的痛苦！本课程

拥有内科、妇产科、心内科等多方面的强大阵容，将从合理用药、生理基础、改善生活质量等方面来帮助你了解更年期女性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方案。相信这是一门能促进你和妈妈之间感情的好课，还在犹豫什么？

身边的营养学

开课时间：2014 年 9 月 15 日

任课老师：许雅君 (Ya-jun Xu)

开课学院：医学部

开课人数：大于 1431 人选课

课程直通车：
<https://www.edx.org/course/pekingx/pekingx-18000123x-shen-bian-de-yi-ng-yang-3041#.VDjgGfmSzp9>

“身边的营养学”将向你系统地讲授营养学的主要概念及方法，利用生活中的实际案例，和你分享各类营养素的适宜摄入量、食物来源及与常见慢性病的关系，教会你如何在全面理解各类食品的营养价值的基础上，将营养学基础

知识与机体健康紧密结合，理论联系实际，解决生活中的实际膳食问题。提升吃货素养，还等什么！

3 流行病学基础（上）

开课时间：2014年9月15日

任课老师：李立明（Liming Li），胡永华（Yonghua Hu），詹思延（Siyan Zhan），吴涛（Tao Wu）

开课学院：医学部

选课人数：大于1478人

课程直通车：
<https://www.coursera.org/course/bjmuepiabc>

流行病学是研究人群中疾病与健康状况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并研究如何防治疾病及促进健康的策略和措施的科学。作为医学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本门课程将使你掌握流行病学的原理和概念及在医学领域中的应用；初步掌握流行病学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实施步骤；初步掌握利用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结果进行卫生防疫、防病策略的制订和措施的选择；以及独立进行流行病学研究设计、实施与分析的基本理论与技能。

号外：流行病学也即将在中国大学MOOC上开课啦，课程时间是2014年11月4日-12月21日，没来得及赶上9月开学季的同学这次不要再错过咯~！

4 软件包在流行病学研究中的应用

开课时间：2014年9月15日

任课老师：吕筠（Jun Lv），余灿清（Canqing Yu）

开课学院：医学部

选课人数：大于935人选课

课程直通车：
<https://www.coursera.org/course/epiapps>

流行病学的研究离不开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可是如何面对浩如烟海的数据时仍旧保持从容镇定？本课程将结合PASS、EpiData等多种软件，以及无纸化调查等方式来介绍从研究设计、现场数据采集和录入，到数据清理和分析，还有常用的几种软件包的使用方法，并强化流行病学基础理论知识的灵活应用。

编辑：慕小编

来源：微信公众号 北大MOOC

慕课，一场人人受益的教育革命

人类历史上经历过两次知识大普及的革命：第一次是印刷术的发明，第二次是电视的革命。印刷术的发明让知识不再被少数一两个人垄断，而是逐渐普及到更多的人中；电视革命则让知识的载体从单纯的文字变为文字与画面相结合。如今移动互联网时代引发的慕课革命与个人电脑引发的教育变革一脉相承，也将对人类知识的普及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谈慕课革命慕课革命不是洪水猛兽，因此不存在革命的受害者一说。慕课（MOOC）是新近涌现出来的一种在线课程开发模式，它发端于过去的那种发布资源、学习管理系统以及将学习管理系统与更多的开放网络资源综合起来的旧的课程开发模式。通俗地说，慕课是大规模的网络开放课程，它是为了增强知识传播而由具有分享和协作精神的个人组织发布的、散布于互联网上的开放课程。

谁也不能忽视慕课革命带来的改变，但大可不必过于惊慌。慕课革命不是洪水猛兽，因此不存在革命的受害者一说。我甚至认为，慕课革命下，所有的人都是受益者。慕课革命是移动互联

网革命的一部分，这次革命不仅让教育以慕课的方式得以呈现，而且产生了更多的教育呈现形式。这次革命带给整个世界的好处远大于坏处。

有些人说，慕课时代，多数学校都会关门。这种说法我不太赞同。如果说慕课对传统学校等教育机构有冲击的话，受冲击较大的是占据教育制高点带有资源垄断性质的教育公司、大学、中小学等。慕课会让它们失去垄断地位，并不会引起传统中小学、大学大面积关门。

之所以下这种判断，是因为人与人之间面对面交流依然是教育的重要环节。学生之间及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讨论，老师对学生的引导等，依然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慕课形式下，最有可能的是，当地老师不再主导上课，而是让学生上全世界最优质的课程资源，但学生要在当地老师的指导下进行讨论和互动。在这里，现场老师不是不重要，而是变得更重要了。

慕课会不会对学校带来革命性的影响？狭义地说，确实会对部分学校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如果教育部规定，学生在慕课上完成一定学分的课并且考核合

格的话就可以拿到毕业证，那么中国很多二三本院校可能会出现招生困难。很多学校甚至有可能逐步倒闭或被关掉。这也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相关部门的配合来实施，因此也是个长久的过程，不可能瞬间出现革命性的改变。

而且，虽然教育资源是可以分享的，但学校本身应该是个性化的。哈佛有哈佛的个性，北大有北大的个性。个性不同的学校，培养出的人才不同，所培养的人才思维方式也不一样。如果慕课只让全世界所谓的最好的十几个教授来讲授课的话，那么这也是一种悲哀。这甚至会变成，除了那十几个教授外，在这个领域别人的思想无法得到传播的地步。教育是一种事业，任何机构都有存在的可贵之处。

谈新东方模式技术能搭一个架子，但架子上放什么东西，是需要你来做的。谈慕课必然会谈新东方。坦率地说，现在很多非刚需性的语言培训已经被线上培训取代了，而且这比慕课还早。新东方很早就实现了通过网络点对点教学生，也很早就通过个人电脑、手机等传送讲义、录音、视频等。当然，语言培训的面授方面还是会受到冲击的，新的参与模式在逐渐取代在教室固定上课的传统模式。但是，教学点和教师的价值

依然存在。

其实慕课对新东方的冲击不是很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现在3到18岁之间的孩子们，还不太接受纯粹在网上学习，孩子的家长也不太接受。由于自觉性不够，孩子在视频上学习时精力不能集中；缺乏老师与学生面对面交流的感觉。我问过中学生，他们觉得通过网上在家里学习非常孤单，集中不了注意力。

18岁以上人群，我叫做高度自觉人群，包括考四六级、考研、出国考试的这些学生，大部分会转到线上去，当然部分还会在线下，但未来一定会以线上为主。理由是，这些学生的时间本身就非常紧张而且他们的学习自觉性很高，在线上学习课程应该没有问题。我们就是要把这些课程最优质的资源放到线上去。而且线上基本是免费的。不过，我们线下会组织这些学生的学习俱乐部。这是我们面对自觉性人群要做的事情。

这样一来，新东方庞大的教师队伍就变成了学生的咨询导师，他们可以把课放到网上，同时进行线上直播。其实，一个老师不可能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的，很多学生都希望得到老师大课以后的一对一辅导，这些老师从教几百学生转为对学生个位辅导。教大课的老师依

然还会存在，教大课属于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化。教育首先是教育资源的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新东方在过去 20 多年积累了大量的教育资源、教学资源、两三千年的学生数据、大量的师资队伍。这些在慕课时代，也就是互联网教育时代是不可少的资源。因为技术能搭一个架子，但架子上放什么东西，是需要你来做的。不管架子多么漂亮，上面没有东西也是不行的。新东方的后发优势在于其 20 多年的积累，对教育的深刻理解，并且把对教育的这种深刻理解用到移动互联上去。

谈教育公平中国最紧急需要解决的是中小学教育的不均衡问题，还有就是中国职业人士的培训，尤其是基本的职业技术的培训等。汤敏的这本《慕课革命》主要讲的是，让中国人民最需要的课程在慕课系统中实现。它与美国的慕课模式不太一样。现在美国的慕课模式对应的是精英教育，全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教授在上面授课。这些课的目的用户是全世界想要听这些课的人们，以及美国想要听这些课的人。美国人做这个的前提是，教育已经基本均衡发展了，在每一个板块的教育体系都已经相对完整的基础上，让各个板块分享更加精英化的课程。

当然，中国北大、清华优秀教授的课也可以通过慕课向全中国的大学甚至中学去扩散。不过，就像汤敏在书中所说的一样，中国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大众化教育问题，如，中国最紧急需要解决的是中小学教育的不均衡问题，还有就是中国职业人士的培训，尤其是基本的职业技术的培训等。中国的职业技术学校在全国有很多，水平千差万别，有的职业学校教出来的学生职业水平很高，有的学校教出来的学生还是小混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中国的慕课，先从这样的基础教育入手，来弥补中国教育的不公平问题，以及从职业教育入手，弥补青年孩子们从学校走出来，找不到工作这种问题。我是比较同意汤敏所说的，在这两个方面下功夫这样的说法。

如何从这两个方面下功夫，汤敏老师点到为止，没有急于去深化。毕竟这是一个非常新也非常大的社会命题，很多问题还有大量讨论的空间，如政府该如何应对这两个问题，民间力量该如何调动，当地学校该用什么样的组织架构等。我觉得可以用一两个地区来实验，国家来提供实验的支持，摸索出经验后，向全国推广。现实中汤敏老师已经做了双师教学的实验，目前真正大规模的慕

课实验还没有出现过。这些问题需要长时间的讨论。

尽管国人对慕课尚存疑问，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慕课有利于教育公平。任何国家都会关注教育公平的问题。多年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信息化，在很多偏远地区铺网线等，做了很多实际工作。做这些工作背后的逻辑，就是

想把优质的教育资源传输到偏远落后地区。政府为做这件事花了很多钱，做了很多努力。在慕课时代，随着 4G 网络全面覆盖的移动互联网普及，很多偏远地区将以非常好的形式，分享一流的教育资源。这将大大加强教育的公平。

编辑：慕小编

来源：北大 MOOC

■ 北大人物

俞孔坚：重建人与土地的真实关系

1997年，哈佛设计学院学成的俞孔坚回到了祖国。中国大地上迅速蔓延的城市化进程，激发了他作为一名景观设计师的使命感与自信心。在北大任教的同时，他创办了城市规划与景观设计公司，在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同时，开展广泛的实践。从1999年都江堰广场的设计方案赢得比赛以来，俞孔坚的城市和景观设计作品已遍布全国和海外，曾九度斩获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荣誉设计和规划奖，五次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三次获得全球最佳景观奖，两次获得国际青年建筑师优秀奖，三次获世界滨水设计杰出奖，并获得2008年世界建筑奖，2009年ULI全球杰出奖，中国第十届美展金奖等诸多重要奖项。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包括创大规模的实践活动、理论研究、办学科和学院、创办专业杂志和网站等，使西方的建筑评论家称俞孔坚“是一个仿佛精力无限的充满着雄心壮志的人，他的工作同时在多个层面上进行”、“有着吞咽一切的胃口”。俞孔坚的雄心和激情，大概可以用他的金华同乡、诗人艾青的名句来解答：“为

什么我的眼睛总是饱含热泪，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俞孔坚始终致力于重建人与土地这种深沉厚重的关系，使景观设计回归生存的艺术。而他的教学、研究与实践，并不仅仅局限于广泛参与景观设计，作为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创始人，他在北大乃至世界的讲坛上，传播着他对景观设计的理解，在年轻一代的身上，培育寻回失落的桃花源与伊甸的希望。



从“牛背上读书的男孩”到“当代奥姆斯特德”

俞孔坚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出生于浙江金华东俞的俞孔坚，从小就骑着水牛在农田里劳作，为家乡秀美、和谐的自然所迷醉，被祖先在千百年的生产时间中所积累下的生存的艺术感染，与丰产的土地建立了天然的情感。东俞村式的桃花源并没有永恒地存留下来，俞孔坚的高中时代，这种和谐的自然图景在工业污染、城镇建设的影响下已经日益残破，但牛背上的记忆从未远离过他。

17岁，俞孔坚考入北京林业大学园林系，是家乡300余名应届高中生中唯一考入大学的。“那个时候考上大学就很难了，专业是没得选的。”俞孔坚笑称进入景观设计是“一个偶然”。不过，他又认为与园林、景观设计的结缘是必然。“我是农村的孩子，我热爱土地，热爱清澈的河流，与大自然亲近。”东俞村前有一片松林，有清澈的小溪流过。幼时的他便夜夜坐在水边的青石板上，听长辈谈论关于松林的故事，内心充满对自然的敬畏。

在林业大学求学期间，几位学者对他的景观设计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孙筱祥教授是当时著名的设计师，他认为景观设计是从场地尺度到全球尺度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的一个专业，用“大地

景观”（Earthscape）来描述景观设计，影响了俞孔坚后来的“土人景观”理念。在硕士导师陈有民的指导下，俞孔坚系统研究了景观的感知与评价，并在陈老师的引荐下，结识了中国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前驱北京大学地理系的陈昌笃和北大地理学科的许多老师。此后，师从杨景春和田昭进行了地貌学的学习。从当时中国著名的自然地理学家、旅游规划学家陈传康身上，俞孔坚也获益良多。他长期参与陈传康主持的旅游规划与区域发展咨询，对景观资源的美学评价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992年，俞孔坚来到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攻读刚刚设立的设计学博士学位。他自主选择的3名导师分别是美国景观规划创始人之一卡尔·斯坦尼兹，他是城市规划权威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凯文·林奇的大弟子，还有他曾用将其《景观生态学》著作翻译成教材的理查·弗德曼，以及地理信息系统专家史蒂文·尔文。

俞孔坚师法自然、师法先民、师法科学，甚至也师法赤子。他曾在一次讲演中提到：“我曾拿我的小女儿做实验：大概一岁多的时候，我把她放在大海边上，她就号哭不停，恐惧，因为大海太大了，沙滩太大了。你把她放下来，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自己画了一个

圈，画了一个方位，一个定位。在大地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就不哭了。这就是说，人的第一个需要，就是要在大地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一切无不印证了一个理念：景观设计是一种生存的艺术，需要重归人与土地的真实关系，达到“天地、人、神的和谐”。

秉持着这样的精神，俞孔坚投入到中国的城市规划与景观设计事业中，喊响了自己的一系列设计理念。他反对虚假、堆砌的“造园术”，抨击全国上下风行的“城市化妆运动”，提出了“反规划”、“大脚美学”、“珍惜足下文化”、“提倡白话城市与景观”等一系列振聋发聩的口号。他的设计作品，面对当前中国城市生态中种种棘手的问题，交出了一份份令人称奇的答卷。广东中山岐江公园设计中，他成功地将废弃的工业厂房转化为生态与文化公园；浙江黄岩永宁公园建立了一种生态设计与防洪及城市发展相适应的模式，使人得以“与洪水为友”；上海世博会后滩公园通过景观设计的综合手段，完成了将黄浦江中被污染的劣五类水，变为可供使用的三类净水；哈尔滨群力公园实现了将城市雨水循环利用，在解决城市雨涝的同时，给城市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沈阳建筑大学里，他将稻田引入，

让城市回归生产；秦皇岛森林公园则将单调的速生林转变成了兼具生态保护、生产性和都市游憩地的功能性景观。

俞孔坚一系列富有想象力和革命性的设计实践，在中国广袤的国土和无限的城市扩张中，检验了许多在西方也尚停留在理论阶段的新理念。美国 Sasaki 设计事务所总裁丹尼斯·派茨将俞孔坚与美国 19 世纪中叶的著名规划师和景观设计师、美国景观设计学奠基人奥姆斯特德相提并论：“作为中国的景观设计师，俞孔坚的影响力无人能比，他力图跨尺度进行生态设计，堪称当代的奥姆斯特德。”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建筑学院院长，著名学者施泰纳则把他与现代生态规划之父麦克哈格相媲美：“他的活动范围非常广泛，毫不夸张的说，其影响力可相当于美国的奥姆斯特德或麦克哈格”。

重建人地和谐：教育的力量

“二十世纪末，史无前例的城市大发展，空前紧张的人地关系，亟待相关学科的创新与发展”，1997 年，俞孔坚在北京大学创办了景观规划与设计研究中心，将其设置在享有国际声望的城市与环境学系（原北京大学地理系）。“为什么选择北大？我想正是因为当时的北大在这个领域是一片空白。空白，才有

自由创造的空间，阻力小。空白，往往也意味着挑战。并且，北大深厚的人文社会学科背景也是培养这个学科的绝佳土壤。”

北大最初只是在地理系人文地理学硕士专业设置景观设计学方向，每年只招收2到3位研究生。2003年，中心升级为独立的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并在两年后新增了一个理学硕士和风景园林专业硕士学位专业。

“单一的科研和项目不足以解决中国系统性的人-地关系危机，而传统学科在应对严峻的国土生态安全危机方面有很大局限，重建人地关系和谐的重任有赖于一个新的学科体系和大量专业人才，他们必须有土地的伦理、系统的科学武装、健全的人文修养并掌握现代技术。这样一门对土地进行系统的分析、规划、保护、管理和恢复的科学和艺术就是景观设计学，更确切地说是‘土地设计学’。”因此，俞孔坚坚持推动建立专门的景观设计学院。2010年，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成立。

与大多建立在工科院校、作为建筑学院一部分的设计学科相比，北大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有着鲜明的特点，强调生态设计和规划，尺度小到场地，大到全国。同时，北大的景观设计与地理学

关系也非常密切，引入了相当多的人文地理、自然地理的最新研究理念。

这所年轻的学院也非常注重国际化视野的培养。俞孔坚要求自己的博士生至少要翻译一本英文著作。不少硕士生也主动承担了相关工作。学院邀请了大量国际著名学者和设计师到学院进行演讲，涉及景观设计学相关的许多领域，此类讲座已成为学院教学的一个常规部分。美国著名现代景观设计师皮特·沃克和玛莎·舒瓦茨，哈佛大学景观规划教授斯坦尼兹，哈佛大学建筑学教授、院长莫斯塔法维，系主任瓦尔德海姆教授，瑞士联邦理工大学教授、景观系主任基候(Girot)等一大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专家，都曾先后在北大景观学院的讲坛上发表过异彩纷呈的演讲。

为促进学院的发展，俞孔坚和同事们还成立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招募的国际性跨学科咨询委员会。他们还打算设立景观设计博士和建筑学博士学位。未来，还将提供建筑学、景观设计学和城市规划设计的本科学位。

俞孔坚通过一系列不懈的努力，推动中国认识到景观设计学的重要性。通过培养具有健康、和谐的人地关系理念的景观设计人才，逐渐解决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美国得克

萨斯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斯坦纳这样评价俞孔坚在教育上的尝试：

“俞孔坚作为教育家的方面，在景观设计领域的影响和他作为设计实践者一样卓著和重要。”

北大-哈佛平行课程：一次有益的尝试

2009年，俞孔坚哈佛大学设计学院邀请赴美讲课，主题是关于中国的城市化。讲课过程中，他愈发萌发了联合两校学生开设平行课程的想法——将北大的教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对接，平行发展。

在哈佛，主要是小班教学，学生讲得多、老师讲得少，特别重视学生的创造，课程设置也重视与实际的联系，灵活机动地根据当前面临的问题进行授课。曾经在哈佛大学学习并获得硕士学位、目前就读俞孔坚博士的陆小璇对此深有感触，“当2011年日本近海发生地震、海啸并引发核泄露事故之后，哈佛设计学院立即针对这场灾害带来的景观设计问题专门开设了一门课程。”她介绍。

“中国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大学，尤其是学院的自主权太少。”俞孔坚说，“我们的教学需要和国际对接，借用国外的教学资源。”北京大学目前正在试行的先进

的“小班教学”理念在这门课程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实践。

另一方面，中国城市化的问题对美国的景观设计学科也有巨大吸引力。“中国的问题太复杂，即便是美国的理论也不能囊括。另外，中国社会的发展速度之快，能够让理论迅速得到验证。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推动学科的发展。”

从2010年开始，俞孔坚连续主持四年哈佛大学—北京大学平行设计课程。中方和美方学生一一配对结组，在互联网上分享资料、交流思想，实地考察，并各自独立提出设计方案。2012年2月10日至19日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两名教授和12名研究生来到北京的设计场地，与北大学生在现实空间里展开了课程学习。平行课程也受到哈佛大学的关注，2010年5月的《哈佛杂志》就对该课程和俞孔坚的“大脚美学”、“生存的艺术”等思想做了全面的评述。2013年4月，《哈佛大学校报》(Harvard Gazette)刊发人物特稿“俞孔坚：常怀自然之心(Yu: With Nature in Mind)”，也特别对北大-哈佛平行课程的进行了介绍。文章采访了多位参与平行课程的哈佛大学学生，他们对中国城市建设的规模及速度惊叹不已，在这个课程平台上，他们感受到了中国这片土地可以为

世界的景观设计学提供的宝贵经验和充满挑战的平台，这是北京大学为世界的景观设计人才培养及学术交流做出的一份独特贡献。

平行课程推进过程中学生的各种反馈也引起俞孔坚的反思。“在实践过程中，美国的学生完成的作品经常强调个人思考，各有各的特色，我们的学生却常常做成一个样子。因此我们还要继续鼓励中国学生的个人思考和创造能力。”对于平行课程未来的发展，他的构想是在两校之间进行建立平行课程长效、永久的机制，实现可持续的交流。“目前，我们正在共同致力于在中国建立哈佛城市研究中心，吸引更多的学者，共同建设两校平行课程，当然还可以共同做更多的研究。”

从“绿肺”、“绿肾”到“绿心”： 景观伦理学

眼下，俞孔坚正在从事广州市中心“万亩果园”的规划设计。前期的考察与设计思路的制定，成了他“一次景观伦理的心路历程”。“万亩果园”是幸存于广州市中心的一片绿洲，但近年来由于城市的扩张，果园被不断蚕食，大气与水污染也使果品质量与产量连年下降，百年果园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广州

市政府遂于2012年将其收归国有，并委托俞孔坚，对其进行规划与设计。

万亩果园带给俞孔坚的，是保留满园百年的荔枝树与砍树、挖湖、堆山之间的选择，是朴实无华的古老阡陌与奇花异卉、亭台楼阁之间的选择，是放任果园自然衰退与营造一处农业遗产景观之间的选择。俞孔坚最后的抉择，是通过设计其管理和改造的方式，延续其独特的地域文化景观的演绎过程，维护这一被围困于都市中的农业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并使其适应新的自然和环境，产生新的价值，满足新时代的要求。

俞孔坚这样解释他所遭遇的挑战：

“这些难题既不是设计和工程技术问题，也不是投资和建设的经济问题，而是更深层次的景观伦理问题：如何对待我们脚下的土地，如何对待土地和土地上的物体所构成的整体系统，如何认识景观的历史与特质及其与人和社会的关系，如何认识景观作为人和社会对环境的文化适应，以及人和社会的自我属性的表征。最终，也是人和社会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问题。”他强调，“景观伦理是人的伦理的延展，是社会文明的标志。”这也正是俞孔坚和他的设计团队始终追求的一种景观设计的目标——追求天地，人与神的和谐，这不仅包括了生态

的平衡，也意味着人在景观之间、生存之中找到心灵永久的归属。

“万亩果园”长期被人们称为岭南“绿肺”、“绿肾”，赞颂这片果园对广州生态净化的重要意义，而如今俞孔坚将万亩果园的重新规划称为“绿心主义”——这里是广州这座大都市的绿色

的心脏，同时他也在期盼着，在重建人与土地真实关系的过程中，国人能够从内心深处重新寻获那一片绿意盎然、生机充盈的美好的桃花源。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素馨

唐丽丽：医学不只是装在瓶子里的药

癌症是全世界首要的死因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如不进行干预，2005年至2015年期间将有8400万人死于癌症。

美国癌症医师悉达多·穆克吉在其获得普利策奖的著作《众病之王：癌症传》中写道：“一个希腊语词汇和癌症的历史发生了交汇，那就是‘onkos’——人们有时用这个词来描述肿瘤；现代肿瘤学的用语‘oncology’正是脱胎于此字。‘Onkos’在希腊语中表示一种分量或负载，或者更通常地表示为一种负担——癌症被设想为身体上承载的一种负担。在希腊的舞台上，‘onkos’这个词还被用来描述一种悲剧角色的面具，这种角色的头上往往戴着一个笨重的锥状物，象征着其所承载的心理负担。”

清晰地表达了对人类而言，癌症并不仅仅意味着躯体的痛苦，更意味着心灵的重负。

在人类与癌症抗争的历史中，逐渐产生了一门新兴的学科——“心理社会肿瘤学”，主要研究癌症患者及其家属在疾病发展的各阶段所承受的压力和他们所出现的心理反应，以及导致癌症发生和促进癌症痊愈的心理、社会、行为因素。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康复科主任唐丽丽教授致力于癌症康复的临床工作和心理社会肿瘤学的研究，已有近二十年的时间，她用自己的经验和学术成果，不断地向人们证明：医学不只是装进试管里的各种实验，医学也并不只是装在瓶子里的药，更是一种“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



走近医学心理学：从兴趣到责任

唐丽丽是从内蒙古草原走出来的医生。本科在内蒙古医科大学就读时，她遇到了一位将她领进了医学心理学兴趣之门的老师——金炜。尽管当时医学心理学等人文医学的研究和教学并不受人关注，金炜却充满了信心，每次授课都热情洋溢、神采飞扬，将知识和人文关怀共同传授给了自己的学生。

受金老师的影响，唐丽丽逐渐将研究兴趣转向了患者心理、行为模式和精神状态的相关研究中。研究生阶段，她参与了一个白血病患者行为特征、情绪反应和人格变化的课题研究。这次研究经历不仅使唐丽丽的医学心理学研究与肿瘤学建立了联系，也促使她从研究兴

趣深化到了一种深深的责任感。在收集病例的过程中，她目睹了大量年轻患者遭受巨大的痛苦却得不到有效的心理救助和康复指导，心灵被深深触动，立志深入学习和研究能够为患者提供心理救治的科学。

1996年，唐丽丽进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康复科工作。这是中国第一个在专科肿瘤医院建立的心理社会咨询服务专科。唐丽丽是当时科里唯一的一个“科班出身”，迅速成为了科研和临床实践的中坚力量，参与了康复科的多项改革。从消除患者的“病耻感”、鼓励他们与家属共同走进康复科，到采用心理痛苦温度计（Distress Thermometer）等快速筛查工具对患者进行心理社会痛苦评估，从撰写专业的心理肿瘤学教材、培养专业人才，到推动康复科成为独立挂号、独立诊疗的门诊，唐丽丽付出了大量心血，见证了康复科规模的扩大和专业性的逐步提升。

为了更好地为发展中的心理社会肿瘤学服务，2012年，唐丽丽与同事在参考国内外大量文献与书籍的基础上，融入本土社会文化的特点，编写了一本中国自己的《心理社会肿瘤学》教材。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专门为这本书撰写了序言，指出在

癌症研究中“从只关注疾病到开始关注患者本身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并满怀希望地写道：“我们对朝气蓬勃的年轻团队充满信心，对这个学科的未来充满希望。在中国目前的医疗体制格局下，错综复杂的矛盾纠结导致医疗卫生行业整体被质疑，将心理社会领域的内容整合到恶性肿瘤的临床治疗护理当中已成为医学发展的必然，如何为患者提供更人文的关怀和治疗是肿瘤界医务工作者的重大课题。”

心理社会肿瘤学：美国的经验

在肿瘤医院工作的过程中，唐丽丽感觉到，中国迫切需要学习西方心理社会肿瘤学的先进经验。2005年，唐丽丽赴美国心理社会肿瘤学的发源地、相关研究的巅峰——纽约斯隆凯瑟琳癌症纪念医院进修，初到就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深切感受到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1970年代之前的美国，癌症诊断和治疗并不发达，癌症患者的心理感受更是鲜少受到关注。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曾签署了“向癌症宣战”的国家计划，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机构（NCI）获得了651亿美元的巨额科研经费，美国的癌症研究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对癌症的认识也日趋全面，逐渐认识到癌

症是一种“生活方式疾病”，在病理、化学和生物因素之外，开始重视社会心理因素在癌症发病和治疗过程中的作用。

1977年，心理肿瘤学家吉米·霍兰（Jimmie C Holland）在斯隆凯瑟琳癌症纪念医院成立了一个小型的精神科，开始对癌症患者的心理、行为问题和精神并发症进行观察、调查和干预，成为美国心理社会肿瘤学的发轫之地。经过30余年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领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从日光暴露与癌症预防、化疗药物不良反应引起的神经精神副作用到儿童肿瘤患者及其家长的心理问题都有专门的研究，可谓包罗万象。治疗的手段也非常丰富，包括个体心理治疗、集体心理治疗、夫妻心理治疗、家庭心理治疗、认知行为治疗、冥想、艺术治疗、心理教育性干预、危机干预、精神急症的处理、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等。

为了更好地从美国“取经”，唐丽丽找到了心理社会肿瘤学“第一人”吉米·霍兰，投入她的门下学习。霍兰教授为人谦和友善，也很关心中国癌症康复和心理肿瘤学的发展，对唐丽丽进行了悉心的指导和帮助，并授权唐丽丽翻译了她的几本重要著作。她们的师友之谊

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唐丽丽的邀请下，吉米·霍兰多次来到中国讲学，为中国心理社会肿瘤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癌症“人性”的一面

唐丽丽编写、翻译了大量关于心理社会肿瘤学的专著，其中翻译自吉米·霍兰的《癌症人性的一面》用亲切、通俗的语言，系统介绍了心理社会肿瘤学所关注和践行的理念，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癌症“人性”的一面，直接挑战了人们对癌症的传统印象，转而为更加具有人文关怀的视角来看待这种古老的恶性疾病及其患者。

癌症“人性”的一面首先将视线转向了一个个活生生的患者和他们的家庭，唐丽丽说，每一个人都有三部病史——生物的、心理的和社会的，而非只是躯体的。这种叙事医学的视角，还原了一个完整的、有着多面复杂人性的人。对于不同的人，也需要采用不同的治疗方式。吉米·霍兰在书中形象而风趣地说：“应该对每个人自己的应对方式表示尊重和支持。对一些人说，想象自己是骑着白色骏马与癌症战斗的勇士是很棒的；但对一个安静和内向的人来说却可能是灾难和额外的负担。”

同时，“人性”的一面也体现在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上。正如特鲁多医生的那句格言：“医生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癌症患者承担了巨大的心理和身体痛苦，害怕死亡、疼痛、丧失功能，也充满着对家庭和未来的担忧。肿瘤医生更应更多地倾听、安慰，了解患者的心理感受，而不是把他们视为一个个“喘气的瘤子”。唐丽丽用“鱼说，你看不到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说，我能看到你的眼泪，因为我在你心中”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医患沟通的真谛——只有把患者放在心中，才能真正帮助他们。

在翻译这部西方经典专著的过程中，唐丽丽还特别注意引入本土化的经验，缩减原著中对宗教、西方医疗政策法规的阐述，更多地使用中国百姓较容易接受的方式撰写。针对中国癌症患者受家庭影响较大的特点，还特别强调了与家属有关的内容。

“姑息”是另一种积极

目前，心理社会肿瘤学所倡导的癌症康复手段多种多样，以唐丽丽所在的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康复科为例，已经囊括了心理门诊、睡眠门诊、疼痛门诊、中医康复门诊、理疗按摩门诊等多个专门化的治疗单位，改善患者在癌症诊断

及治疗过程中的各种症状，如疼痛、失眠、呕吐、厌食、焦虑、抑郁、谵妄等，并为患者及家属开展心理咨询及治疗，同时为失眠的患者开展生物反馈治疗、冥想、安思定睡眠仪等疗法，并为癌症患者的康复开展中医、理疗、按摩等治疗。

其中的很多治疗手段都可以被概括为“姑息”治疗（palliative care）。在中国人看来，“姑息”是一个消极的字眼。但在癌症的治疗与康复中，“姑息”是另一种积极。唐丽丽介绍，“姑息”疗法发端于英国，在引入中国大陆时译成了“姑息”，而在港台地区，则多用“宁养治疗”、“舒缓疗法”来称呼这种疗法。姑息治疗通过早期识别、积极评估，控制疼痛和治疗其他痛苦症状，包括躯体的、社会心理和宗教的干扰，预防和缓解身心痛苦，从而改善面临生命威胁的患者和他们的亲人的生命质量。

肿瘤医院康复科开展的另一项富有特色的治疗方式是冥想疗法。“冥想”疗法是一种想象性心理治疗方法，通过观想一个对象，使人心智专注，并通过积极的想象将健康开放的意识注入到人们的精神中去。这种疗法凝聚了很多东方独有的智慧。唐丽丽说，从医学科学

的角度来看，“冥想”疗法是大脑与内分泌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她特别指出，现代人生活在一种浮躁的心态之下，被焦虑等情绪控制，往往无法了解自己躯体的实际情况。癌症患者更是被各种负面情绪所左右。通过冥想可以达到深度的放松，有助于改善焦虑、失眠等一系列症状。“正所谓‘静心才能养身’。”唐丽丽说。

2010年，唐丽丽与康复科的同仁们一起，推出了原创音像制品《冥想》，将理论与实际结合、音乐、画面与专业人员的示范相结合，帮助患者轻松练习，一经发行就广受好评，并在肿瘤医院康复科门诊为500多人次的患者进行了冥想治疗。这套冥想疗法还作为一项行为干预技术应用在集体心理干预的研究中。

星星之火 必将燎原

除了出门诊、做科研、参加学术会议和培养研究生，唐丽丽还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心理社会肿瘤学的宣传，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门关注肿瘤患者提高生活质量的科学能够为更多公众了解和接受，也希望推动政府在立法与管理层面重视癌症患者的心理康复。除了《癌症人性的一面》、《冥想》之外，她还撰写了《肿瘤患者身心重塑与功能

锻炼：康复是人生的新起点》，成为国内第一部心理社会肿瘤学原创科普背景，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及文化背景，更贴近中国癌症患者及家属的实际情况。此外，她还先后在《癌症康复》、《心理与健康》、《医学科普》、《健康报》、《医学论坛报》、《健康时报》、《北京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科普文章几十篇。多次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的采访和邀请，做客《健康之路》、《养生堂》等栏目，讲解癌症心理康复知识。每年2月4日“世界癌症日”，唐丽丽及同事们也会参与各类宣传活动。

作为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心理专业委员会常委、北京抗癌协会肿瘤心理专业委员会主委，唐丽丽还致力于心理社会肿瘤学在大陆地区的推广。目前，相关的专业协会已经在西至新疆、南至广西的范围内逐步建立。她专门制作了一幅“全国分布图”，每增加一个省份就划上一个红圈，“‘红圈’在不断增加，但还远远不够。我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进行推广和

宣传，这项事业一定能够在更多的地方生根开花。”

唐丽丽把心理社会肿瘤学这门非常年轻的学科比喻为一株嫩芽，她希望社会各方的力量共同呵护它的成长。“在中国，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无论是医患沟通方式还是对死亡的理解，都使癌症的心理康复在患者中的接受度较低；同时，我国的人口与经济条件，在资源上也限制了心理社会肿瘤学的推广。”，唐丽丽说，“因此，需要全社会的共同重视与推广，推进癌症心理康复事业，真正提高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推进我国的防癌抗癌事业。”

最后，她引用台湾姑息医学之父赖允亮的一段话，送给肿瘤患者、他们的家属以及所有关心癌症心理康复的人：“如果想象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你会发现这绝不仅仅只靠奶粉和水，更需要的是爱。癌症的康复过程也是一样。”这也正印证了那句话——医学不只是装在瓶子里的药，而是充满人文关怀的、对人身体和心灵的全面关注。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素馨

学者谈读书

黄宗智：如何阅读学术著作和做读书笔记

1、阅读方法

首先要养成连接概念与经验的阅读习惯。读书必定要首先掌握作者的中心论点（当然有许多没有形成中心概念的著作，甚或主要是经验信息堆积类的著作，有的价值不大，但有的是十分珍贵的参考书。我这里关心的不是参考书的编撰，而是学术专著的写作），而为了精确地掌握一本书，也是为了锻炼自己概括能力与养成连接经验与概念的思维习惯，我特别强调读书笔记要总结作者对自己中心论点的主要经验支撑证据，并同时照顾到中心论点次一级的阐发性概念及其经验根据。最后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作者把你说服了没有？为什么？（更有进者，如果由你来写这本书，你会做怎样的修改？）这样的读书习惯也是为自己做学术研究，写学术专著的一种锻炼。能够清楚掌握好的专著的设计和结构，才有可能自己撰写优秀的学术著作。

这样的读书习惯另外有一个很实用的考虑，就是为了积累自己将来研究和教学的可用材料。根据我自己的经验，

我们看书之后，在个把星期到几个月之中，对一本书的记忆是比较清晰完整的，之后便逐渐模糊，几年之后便几乎不可能在脑袋里作详细的找回检索。因此，我们要在记忆清晰的时候，精确地总结这本书以备将来之用。而这样的总结，不是被动的摘抄，而是积极的消化，迫使自己在记忆最完整的时候，按照上述的方法精确地掌握这本书并对之进行系统思考。那样，将来可以随时找回检索使用。我自己要到30岁之后才清楚了解到自己的记忆（或仅仅把书排列在书架上）的不可依靠，开始积累笔记。有不少在研究院时候读过的书，后来都得回去重看。

2、理论学习

前人有众多的理论著作，对我们来说是有用的资源。我自己提倡的途径是要掌握主要不同流派的理论，作为入门途径。阅读时要求与之对话，而不是简单的死学。而对话、决定取舍的最好方法，乃是看它对组织、解释自己掌握的经验材料有用没用。

学习理论的目的不是寻求或掌握全

能性的真理，而是提出问题，较高的一个境界是在理论和实际脱节点上，或不同流派理论的交锋点上，提出问题，试图超越现存视野。另一用途是通过与现存理论的对话来澄清、推进自己的分析概念。这样，理论更多的是工具或对手，而不是答案。

另一个有用办法是：区别经典理论与庸俗理论；前者较少，后者俯拾皆是。前者一般视野比较宽阔，提出的概念更清晰并强有力，后者则比较模糊繁杂，除非和自己的研究课题有直接联系，一般用途不大。这种庸俗模式的大量存在本身便是西方形式主义倾向的一个例证：今日美国一般的社会学、政治学系，对学生们要求的是首先建立所谓“理论”或模式，然后才做经验研究，这种认识方法的结果之一是模式堆积如山，绝大多数十分庸俗。而与这样的模式“对话”，虽然可能会起点公关作用，但对推进和提高自己的分析概念不会有太大帮助。最后一种可行的理论学习方法是：先在某一种流派之中，深入浸淫一段时间，作为入门方法，锻炼自己概括和连接概念的能力，然后进而学习其他流派。国内许多年长一点的学生，已经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可惜的是其教学方法，大多是当教条死背，而不是活学活用用来提出问题。但也有少数的学生，还

是能够从其中得到概括能力的锻炼，这是宝贵的资源，可以当作学习其他流派理论的基本功。

3、写读书报告

学术著作都应带有一个中心论点，而阅读那样的著作，首先是要掌握其中心论点，用自己的话（一段，甚或是一句话）表达出来。然后，用三、四段总结其主要的次级论点，同时总结其经验证据。总结的时候，关键在于不要摘抄，要用自己的话，因为那样才会消化，使它变成自己的东西。一个可行的阅读次序是先看首尾，掌握其中心论点之后才逐章阅读，每章看完之后用自己的话总结。最后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作者把你说服了没有，为什么？（甚或更进一步：如果由你来写这本书，你会做怎样的修改？）至于比较纯理论性的著作，我们要问：它对了解中国的实际或你自己的研究课题有什么用？这样的看书写笔记方法乃是一种思维上的锻炼，也是养成自己的思考、写作习惯的办法。关键在养成看后就写系统笔记的习惯，不可依赖自己的记忆，因为几个月（最多一两年）之后肯定会变得模糊不清。笔记最好既不要太简短也不要太详细，应在一、两千字的范围之内。这样长年积累，随时可供将来的研究和教学之用。

4、研究写作

我这里要强调的是，设计论文首先应要求自己能在经验层面作出前人所未做的贡献，因为作为一个青年学者，思想上多未完全成熟，若能老老实实做经验研究，最起码可以在那个层面上做出新的贡献。但这不是说要只作经验信息的简单堆积，因为那样无从区别重要和不重要的信息。优秀的学术贡献需要带有明确的问题，经验证据的目的是用来解决重要的问题，而问题的建立要靠经验与理论的连同使用，不可只靠单方面。最理想的状况是通过新鲜的经验证据来提炼新鲜的概念，用以解决重要的理论问题。而所谓理论问题，上面已经提到，既可以是不同流派理论的交锋点，也可以是理论与实际的脱节点。另外，最好是自己特别关心的问题，因为那样才会有驱动力，使自己作出长时期的持续投入。

这里应该说明，寻找自己最想做而又是最能做的题目常常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我当年便因导师的影响而选择了思想史的题目，并试图为导师而挑战当时占美国首席位置的 Joseph R. Levenson。后来才发现，自己无论在感情上还是能力上，都更倾向于关注普通人民，而又比较喜欢解答有关人们实际生活的问题，更合适做经济史、社会史和法律史。

但清楚认识这一点的时候已经近乎不惑之年了。基于以上的经验，我自己一贯避免指定学生做某个题目，因为我认为这几乎等于是在替他们找对象。做学问是个长时期的磨练，十分必要找到自己真正愿意一生与之作伴的主题，但国内由导师包办的做法仍然比较普遍，亟需改革。

最后，怎样在经验证据上提炼新鲜概念。上面已经提到，一个好的方法是从经验证据与现存理论的脱节点出发，与现存理论，尤其是经典性的著作，对话来澄清、推进自己的概念。最好是跨越不同流派的理论，因为同一流派中的论证，多只关乎次级问题，而不同流派的交锋点，常常是最为基本和关键的问题。有的同学可能会觉得掌握单一流派的理论已经不容易，要求同时与不同流派对话，可能是过分苛求。但实际上，只掌握单一流派，常常会陷于不自觉地完全接受其预设前提，久而久之，甚至会以为是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的“真理”，因此陷入由意识形态主宰的研究。而且，通过不同流派之间的争议，可以更清晰深入地同时掌握不同概念，并把自己的认识和问题提高到最基本的层面上。这方面中国的研究生其实具有比美国学生优越的条件。作为处于两种文化冲击下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研究生更能体会到

理论与实际的脱节以及不同理论之间的交锋。今天中国的研究生，几乎不可避免地都是“双重文化人”（见黄宗智《近现代中国和中国研究中的文化双重性》），和美国一般研究生很不一样。若能既不迷信普世理论，又不迷信自己的感性认识，这本身就是一个可资学术使用的重要资源。最后是通过严谨的经验研究与高层次的理论问题意识的探

讨，来回反复连接，由此才可能建立既是中国的也是现代性的学术，并为全人类建立一个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传统的学术传统。

来自：微信公众号 燕南园爱思想

作者：黄宗智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上）

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在《大英博物馆日记》的后记中，我引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里的王子猷夜访戴安道故事。真希望“读书”也能到达这个境界：“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考试？何必拿学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当然，如此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读书”，是一种理想境界，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一、读书的定义

什么叫“读书”，动词还是名词，

广义还是狭义，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还是“学得好不如长得好，长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读书？看来，谈论“读书”，还真得先下个定义。

“读书”是人生中的某一阶段。朋友见面打招呼：“你还在读书？”那意思是说，你还在学校里经受那没完没了的听课、复习、考试等煎熬。可如果终身教育的思路流行，那就可以坦然回答：活到老学到老，这么大年纪，还“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一点也不奇怪。

“读书”是社会上的某一职业。什么叫以读书为职业，就是说，不擅长使枪弄棒，也不是“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过去称读书郎、书生，

现在则是教授、作家、研究员，还有许多以阅读、写作、思考、表达为生的。

“读书”是生活中的某一时刻。“都什么时候了，还手不释卷？”春节放假，你还沉湎书海，不出外游览，也不到歌厅舞厅玩乐。

“读书”是精神上的某一状态。在漫长的中外历史上，有许多文化人固执地认为，读不读书，不仅关涉举动，还影响精神。商务印书馆出版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所撰《阅读史》(2002)，开篇引的是法国作家福楼拜 1857 年的一句话：“阅读是为了活着。”这么说，不曾阅读或已经告别阅读的人，不就成了行尸走肉？这也太可怕了。还是中国人温和些，你不读书，最多也只是讥笑你俗气、懒惰、不上进。宋人黄庭坚《与子飞子均子予书》称：“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问题是，很多人自我感觉很好，照镜从不觉得面目可憎，这可就麻烦大了。

这四个定义都有道理，得看语境，也看趣味。以前说“学而优则仕”，现在变了，是“仕而优则学”——这后一个“学”，当然是装模作样的了，“‘官大学问大’嘛。中国特有的学历高消费，让人哭笑不得。如果有一天，连学校里

看大门的，也都有了博士学位，那绝不是中国人的骄傲。眼看着很多年轻人盲目“考博”，我心里凉了半截，我当然晓得，都是找工作给逼的。这你就很容易明白，很多皓首穷经的博士生，一踏出校门，就再也不亲近书本了，还美其名曰“实践出真知”。

想到这些，我才格外欣赏那些不为文凭，凭自家兴趣读书的人。在北大教书，自然是看好自己的学生；可对那些来路不明的“旁听生”，我也不敢轻视，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教室里有位子，你尽管坐下来听。这种不太符合校规的通融，其实更适合孔夫子“有教无类”的设想。

拿学位必须读书，但读书不等于拿学位。这其中的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1917 年，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开学演讲时，专门谈这问题，希望学生们以学问为重，不要将大学看做文凭贩卖所（《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第二年开学，蔡先生再次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日后回想北大十年，蔡先生很得意，以为他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大学的想像（参见《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以及《自写年谱》）。现在

看来，蔡先生还是过于乐观了，成为“贩卖知识之所”的大学，以及视大学为“养成资格之所”的学生，当今中国，比比皆是。

大致感觉是，今日中国，“博士”吃香，但“读书人”落寞。所谓“手不释卷”，变得很不合时宜了。至于你说读书能“脱俗”，人家不稀罕；不只不忌讳“俗气”，还以俗为雅，甚至“我是流氓我怕谁”。

二、读书的成本

现在流行一个说法，叫“经济学帝国主义”，说的是经济学家对自家学问过于自信，不只谈经济，还谈政治、文化、道德、审美等，似乎经济学理论能解决一切问题。于是，讲机会，讲效率，讲成本核算，成了最大的时尚。你说“读书”，好吧，先算算投入与产出之比，看是否值得。学生选择专业，除个人兴趣外，还有成本方面的考量，这我理解。我不谈这些，谈的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及精神状态的“读书”。

作为一种物质形态的“书籍”，与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读书”之间，有某种微妙的关系，值得仔细钩稽。这里所谈论的“读书成本”，带有戏拟的成分，可博诸位一笑。

那是一则现代文？史上的公案。这么

多劝学诗文，最有趣的，莫过于《礼拜六》的说法：“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健康，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也就是说，读书好，好在既便宜，又卫生。“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王钝根《〈礼拜六〉出版赘言》）《礼拜六》诸君越说越邪乎，甚至在报纸上登广告：“宁可不要小老婆，不可不看《礼拜六》。”这下子可激怒了新文学家，叶圣陶撰《侮辱人们的人》，称：“这实在是一种侮辱，普遍的侮辱，他们侮辱自己，侮辱文学，更侮辱他人！”宁肯不要小老婆云云，当然是噱头，不可取；可也说出实情：随着出版及印刷业的发展，书价下降，普通人可以买得起书刊，阅读成为并不昂贵的消费。起码比起大都市里其他更时髦的娱乐，是这样。我说的不是赌博、吸毒或游走青楼等不良行为，比起看电影，听歌剧，观赏芭蕾舞、交响乐来，读书还是最便宜的一——尽管书价越来越贵。

现在好了，大学生在校园里，可以免费上网；网上又有那么多文学、史学、哲学名著，可以自由阅读乃至下载。好歹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之余，你干什么？总不能老逛街吧？听大歌剧、看芭蕾舞，很高雅，可太贵了，只能偶尔为之。于

是，逛书店，进图书馆，网上阅读等，成了日常功课。可问题又来了，阅读需要时间。

十几年前，在香港访学，跟那里的教授聊天，说你们拿那么多钱，做出来的学问也不怎么样，实在让人不佩服。人家说，这你就外行了，正因为钱多，必须消费，没时间读书。想想也有道理。大家都说七七、七八级大学生读书很刻苦，他们之所以心无旁骛，一心向学，除了希望追回被耽误的时光，还有一点，

那时的诱惑少。不像今天的孩子们，目迷五色，要抵抗，很难。我的经验是，穷人的孩子好读书，一半是天性，以及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一半则是无奈，因太时尚太高雅的娱乐玩不起。不过，没关系，这种选择的限制，有时因祸得福。作为生活方式的读书，对财力要求不太高，反而对心境和志趣要求更高些。

作者：陈平原

来源：陈平原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

好文共赏

有 7000 多种语言，就有 7000 多个“平行世界”

学过外语的人都知道语言之间的差异有多大。全球约有 7000 余种语言，每一种都各有特点。最明显的是词汇的差异，但语法结构的差异也同样明显。

举个例子，英语里的一首童谣开头是这么唱的：“Humpty Dumpty sat on a wall……” 这句话简单至极，但是想要把它译成其他语言，问题马上就来了。首先是动词 sat，这个动词的时态变化表明该动作发生在过去，will sit 则表示发生在将来，而 sitting 表示正在发生。

但是，在其他语言，例如印尼语（以及汉语）中，动词本身是没有时态变化的。而在俄语中，动词不仅有时态的变化，还有性别的变化以及动作完成与否的变化。在土耳其语中，你需要根据信息的来源来对动词进行形态变化。某人是亲眼目睹还是道听途说某事，只需看动词的形态变化就能发现。

语言创造的平行世界

不同的语言是否会使人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与思维方式的关系究竟如何？数千年来，人们对此争论不休。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曼大帝曾说过“掌握第二种语言就是拥有第二个灵魂”。他的一位继任者查理五世也说过“一个懂得四门语言的人抵得上四个人”。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语言没有那么重要，例如，莎士比亚笔下的茱丽叶就说过“一朵玫瑰无论换什么名字闻起来都是甜美的”，这种观点认为人们对事物的指称无足轻重。

到了现代，这两派观点仍各有支持者。美国语言人类学家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就认为语言对思维有很大的影响，并提出了著名的沃尔夫假说。而反对者则认为，语言形式只反映了人类所知的一小部分。人们能够理解相同的事情、对此事有着相同的记忆、以相同的方式看待世界，他

们仅仅是在句子中呈现了不同的信息罢了。

不久之前，这一些还都只是猜测和假说，缺乏实验证据的支持。但是现在，有了鲜活的事例来证明语言对思维的重要影响。我将在下面举出三方面的例子，语言如何影响我们 ① 对空间和时间的认知；② 对性别的认知；③ 对因果关系的认知。

1. 语言如何影响空间和时间认知

有一些语言中没有表示“左”“右”的词语，史蒂夫·列文森（Steve Levinson）和约翰·哈维兰（John Haviland）首次观察到了这种奇妙的现象。在这些语言中，所有事物的位置都是用绝对空间来表示的，这就意味着人们会说“你朝着西北方向的那条腿上有一只蚂蚁。”或者“你能把杯子往东南边挪一下吗？”想要这么说话，你必须保持良好的方位感，知道自己正朝着哪个方向。而且这不仅是短期内保持方位感，你全部的关于过去的记忆也必须是“找得着北”的，只有这样你才能生成诸如“我把水杯放在电话的西南边了”等记忆。这些语言的使用者，即便是儿童，也都有极强的方位感。澳大利亚、中国以及南美洲等地都有这样的语言。

我曾在美国调查过很多人，其中包括杰出的科学家和教授，有时是满屋子的学者，我要求大家闭上眼，然后用手指出东南方向。人们的反应通常是哈哈大笑，他们会想“多搞笑的问题啊，我怎么可能会知道啊？”有很多人都不愿意参加这个小测试，他们确实不辨东西南北。而那些愿意尝试的人，通常要反应好一会，然后指什么方向的都有。

后来我有幸和爱丽丝·加比（Alice Gaby）在澳大利亚造访一个使用此类语言的原住民部族——Kuuk Thaayorre部族。我在这个原住民社区里遇到了一个5岁的小女孩，我也要求她指出东南方，她毫不犹豫地就指了出来，这个社区的居民均有此本领。而我还要从兜里掏出指南针看看，才敢确认她指的对不对。

我此行的目的是想了解这个部族的空间观念是否会影响他们对时间的认知。我花了很多功夫研究我们是如何建立时间表征的。一般认为人类对于抽象概念（例如，时间）的表征是从具象概念而来的。我们利用语言工具将简单知识的“构造块”组合起来，构成复杂知识。时间概念就是如此，人们将空间表征通过类比，或者说隐喻的方式，对应到更复杂的时间表征上来。倘若确实如

此，那么空间认知必然会影响到对时间的认知。

我和爱丽丝·加比来到澳大利亚正是为了验证这一推论。我要求 Kuuk Thaayorre 部族的人完成一个简单的认知任务。我给每个人发了一套卡片，卡片上绘制的内容表示着时间的流逝，例如其中有我祖父从儿时到老年的不同年龄段的照片。我把卡片的顺序随机打乱后交给当地人，要求他们“按正确的顺序将卡片排放在地上。”如果你是一名英语母语者，你会将卡片从左往右排，而并不在乎你测试时面对着哪个方向，时间似乎是从左往右流的；如果你是从小就说希伯来语，那么你更可能从右往左排。这似乎说明一种语言的文字书写方向影响了人们对时间的想象。不管如何，这种方向都是以我们身体的左右为参照的。

但是 Kuuk Thaayorre 部族的语言中没有“左、右”，他们会如何完成这个任务，会如何想象时间流失的方向呢？答案是从东往西。如果此人面朝南，卡片就从左往右排；如果他面朝北，卡片就从右往左排；如果他面朝东，卡片就朝着自己的方向排（即从上往下）。我之前从未见过这种情况。他们对时间的想象无疑受到了空间观念的影响。

此外，人类对时间的认知非常有灵活性，可谓千差万别。例如，有的文化中将过去放在前面，而将未来放在后面。有的文化中时间的流逝是垂直方向的。在汉语普通话中，过去在上方（例如“上溯”一词；又说“上下五千年”——译注），而未来在下方。

2. 语言如何影响性别认知

俄国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研究方向是语法性别（grammatical gender）及其跨语种翻译。在有语法性别语言中，名词都有其语法类别，简单一点的就分成阴性和阳性（法语），有时分为阴性、阳性、中性三类（德语）。有的语言中名词的性多达 16 种，有时打猎工具可能自成一个语法类，或者犬科动物自成一类，不同的语言各有特色。认知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曾发现一种原住民语言中的语法性别某一类别中有包含女性、火以及危险事物，表示这些事物的名词在语法上是一样的。

雅各布森想知道语言中名词的语法阴阳性是否会影响我们对事物本身的认知。俄语中“周一”是阳性的，“周三”是阴性的，这会影响我们对这两个工作日的认知吗？他做了一个实验，请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们将一周五个工作日以拟

人化的方式表演出来。结果发现，学生们将周一表现得像男性，而将周三表现得像女性。也就是说，俄语使用者对抽象事物进行拟人化时会受到其语法性别的影响。

雅各布森还做了另一个调查，一个针对艺术作品的非正式观察活动。他关注的是艺术家们如何在绘画和雕塑中表现抽象的概念，例如公正、死亡、时间、爱或者宽容。雅各布森希望了解艺术家如何决定这些抽象概念的性别。例如，他发现俄罗斯艺术家会将死亡表现为一位老妇人，而德国人更喜欢把死亡表现为一位男性。雅各布森认为这是受到了语法性别的影响。

最近，我和一位学生一起对一个艺术图片数据库 ArtStor 进行了分析，关注人格化的作品和寓言式的作品。我们判断每一幅作品中形象的性别特征，并且比对艺术家母语中该词语的语法性别。研究发现雅各布森是对的，其中的相关性令人惊讶，有 78% 的作品反映了艺术家母语的语法性别。我们感到惊讶是因为艺术家本应气质独特，不会盲从大众文化。而且个体对于爱、死亡等抽象概念的理解应该是基于各自人生经验的，应该有巨大差异。但是语法性别这

个小小的语言学特征，却可以有力地预测艺术家对于抽象概念的表达。

另一位研究者玛利亚·瑟拉 (Maria Sera) 则关注语法性别对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在一项研究中，幼儿被告知“我们要拍一部动画片，需要你们来帮助我们决定每一个角色需要什么样的声音。这里三个角色：叉子、闹钟和手风琴。请告诉我们，你希望这些角色有什么样的嗓音？”研究结果发现，幼儿会为角色指派与之语法性别一致的声音。尽管幼儿年纪尚小，语法性别已经开始塑造他们的思维方式。

性别还有另一个层面，就是人的性别，而非物的性别。有的语言对人的性别有非常重的标记。英语对性别的标记程度比较一般，而希伯来语对人和事物的性别标记都很重。也有一些语言根本没有性别标记。例如芬兰语中就几乎不包含性别信息。那么语言的这些特征也会影响人们对生物性别的认知吗？

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借助语言之外的手段来了解的。芬兰语的使用者当然也有能力判断人的性别。那么他们的生物性别认知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芬兰的幼儿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意识到自己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亚历山大·奥吉拉 (Alexander Guiora) 就做了一项有趣

的研究，他找来一些以希伯来语、芬兰语和英语为母语的幼儿，这些孩子仍在学习自己的语言。他问每一个幼儿“你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奥吉拉设计了一些灵活的手段，可以了解这些幼儿对自己性别的认知程度如何。结果发现，三组幼儿对该问题的解答速率有所不同。说希伯来语的孩子最快确定自己的性别，其次是说英语的幼儿，最说芬兰语的幼儿速率最慢。当然他们最终都能确认自己的性别，但是这种认知能力的发展速度不尽相同。

在最近的一些研究中，研究人员比较了英语使用者和汉语普通话使用者对人类性别的记忆情况和反应速率。汉语普通话中对性别的标记没有英语强。研究者请被试听一个包含了许多人物角色的故事，然后提问故事，其中有一些问题涉及人物角色的性别。结果发现，汉语使用者在回答与性别无关的问题时反应相当快，而涉及人物性别的问题，汉语使用者的反应要比英语使用者的反应慢，这意味着性别信息在汉语使用者的脑中并不那么重要。

当然，语言不是信息的全部来源，我们的许多知识不是靠语言获得的。但是在语言中有标记的元素会给使用者增加一点额外的“爆发力”，这方面的认

知发展会更快，信息在脑中的表征会更凸显。

3. 语言如何影响人们对因果关系的认知

最后一个例子讲的是因果关系，或者说如何归咎责任。我们周遭发生的事情相当复杂，需要梳理和理解。看见苹果从桌上滚落时，会觉得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现象。但是想要理解这个物理现象，需要具备大量的知识。语言工具对于知识与信息的传递功不可没。

迪克·切尼（Dick Cheney，美国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副总统）有一回与律师哈利·惠廷（Harry Whittington）一同打猎，期间出了意外，切尼开枪打中了惠廷顿面部，整个事件不过发生在转瞬之间。这也是一个简单的物理运动，但是可以用许许多多方式描述此事。欧洲《先驱报》写道“切尼砰了律师”，这种写法给人的感觉是“切尼出去枪杀律师，而且他成功打中了一个”。当然，也可以说“切尼击中惠廷顿”，或者不把重点放在切尼身上“威灵顿被切尼击中”，或者干脆不提切尼，“惠廷顿受枪伤”。

来听听切尼自己是怎么说的，他在一次采访中表示要为此事负全责，“毕竟我是那个扣动扳机开枪击中哈利的

人”，转瞬之间的事情被这句话分解为了一系列动作，拉远了切尼和最终结果之间的距离。小布什的水平更高，他说“（切尼）听见鸟飞动的声音，然后他转身扣动扳机，然后就看到他的朋友受伤了。”最后一个分句彻底将切尼这个施动者转变为了一个目击证人。大师级的辩解之术。

这个例子说明了语言可以对一件事进行各种方式的架构和分析。而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架构、分析方式。切尼和小布什使用的说法不是英语中自然的表达方式，英语母语者觉得这种文字游戏很可疑，好像总在推脱麻烦、逃避责任。就像小孩子和政客为了脱身而说出的话。

在英语中，通常喜欢更直接的表述因果关系，例如“他打碎了花瓶”。但是在其他的语言中，如果一件事是意外，不是施动者故意做出的，人们就不会说“他打碎了花瓶”“他弄丢了书本”，人们可能会说“花瓶碎了”“书弄丢了”等不那么直接的、不把施动者做主语的句子。英语的奇异之处在于，故意事件和偶然事件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这两者的表述方式是一样的，搞得好像要为意外事件负责似的。在某些语言中，你不可说“我摔断了胳膊”之类的话，

除非是你疯了，主动用胳膊撞击硬物，并且成功骨折。

我和我的学生想知道，语言的结构是否会影响使用者对事件责任人的判断和记忆。在研究中，我们给被试播放了一系列故意动作和意外动作的视频，随后测试他们是否能记住这些动作的施动者。被试包括英语、西班牙语和日语的使用者。如前文所说，英语不能很好地区分故意事件和偶然事件，英语使用者在这两种情况中都会描述出施动者。而西班牙语和日语中的使用者在描述意外事件时，通常不会提到施动者。研究发现，不同被试组记忆情况的差异完美地反映了语言结构的差异。描述故意动作时，所有的被试都能回忆起施动者，并且会谈论到施动者。但是在描述意外动作时，差异出现了。英语使用者仍能清楚地记得是谁不小心做了某事，而西班牙语和日语的使用者记得就没那么清楚了，他们也不常提到施动者，也认为没必要记住究竟是谁干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场景的其他方面。

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

读过上述案例之后，有人或许要问，你怎么知道不同国家的人思维方式的不同是由语言差异引起的，而不是由文化差异、环境差异引起的？你怎么知道是

语言影响了思维，而不是相反？或许他们本来思维方式就不同，因此才有了不同的语言。

答案是严格的受控实验可以提出有力的证据。在实验中，我们改变了被试的说话方式，然后考察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否有变化。这是真正的实验，我们做过许多这样的研究。我们发现，如果你教被试一种谈论时间的新方法，这就会改变他们对时间的认知。我们让英语使用者以不强调施动者的方式来谈论一些事件，这就会改变他们对事件的记忆。在其他研究者的实验中，被试学习用新的方式谈论颜色，这改变了他们记忆和区分颜色边界的能力。

这些研究发现语言确实能改变人的思维，但这并不意味着反过来就不成立。思维方式和文化当然也会影响语言。这是一个双向循环，两者彼此影响。正因为这一过程，人类才能迅速地创造出复杂的知识，同时又能灵活地认识世界。

试想，全球有 7000 多种语言，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反映了其使用者数千年来的思想、倾向和认知方式。一种语言就像一个完整的宇宙，人类就有 7000 多个平行的宇宙，有的彼此相似，有的大相径庭。这种巨大的多样性是人类头脑灵活性和精致性创

造出的奇迹。我相信，对人类认知世界的认识越深刻，就越能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本质。

我的研究之路

我小时候生活在苏联，大部分时间待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暑假和祖父母一起住在乌克兰。我最初的语言经历是说俄语，并且听到大量的白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举家迁往美国时我才 12 岁，当然我的一大任务就是学英语。等我学会用英语表达思想时，我首次意识到语言中的词汇和其他元素之间的联系是如何创造出不同意义的。我当时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令思维摆脱这些语言元素。当时我对社会公正问题也很有兴趣，我想，如果要发掘真相和正义，必须要摆脱讨厌的语言，语言就像是笼罩在思维之上的一片乌云，而许多争论都是文字游戏。

我原以为研究语言可以帮助我看清万事的真相，但事实正相反。我在西北大学学习认知科学，并开始在那里开展语言学研究。当对语言的认识越来越多，并开始研究语言差异时，就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意义系统存在于语言之中。词语的模式创造了意义体系，不可能脱离语言谈意义。

少年时代的想法完全行不通，但是我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产生了兴趣。当时我曾与黛德·金特纳(Dedre Gentner)老师一同工作，她是研究类比和关系逻辑推理的世界级专家。正是金特纳启发我走上了后来的研究之路。当时她对于语言影响思维的问题也有兴趣，不过这种兴趣是秘密的，我们在实验室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她提醒我“不要在实验室之外谈论这个话题，因为其他人认为这是个疯狂的问题。”她知道这个问题的争议性。

后来我在斯坦福研究生时的导师是戈登·鲍尔(Gordon Bower)，研究记忆的世界级专家。我开始在他的指导下研究空间与时间之间的隐喻。当我把研究的初稿给他看时，他说“如果你是正确的，这就意味着有不同时间隐喻的人对时间也会有不同的认知。但是我们知道语言是不会影响思维的，因此你很可能搞错了，再回去想想吧。”

我觉得可能是我弄错了，也可能是语言确实影响思维，或许我应该再做一些实验。就在那段时间，道格·霍夫施塔特(Doug Hofstadter)来斯坦福访问，我向霍夫施塔特介绍了自己的研究。他有一个学生研究汉语普通话与英语在时间隐喻上的不同，他建议我也关注这个

问题。于是我终于走上了现在的研究之路。从斯坦福毕业后，我去了MIT研究大脑和认知科学。我进行了更多的跨语言比较研究，并在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进行田野调查。后来斯坦福又聘用了我进行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研究。

研究之初，我的看法是非常天真的，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有着巨大的争议性。语言影响思维，在我看来是一个再合理不过的推论。认知心理学家们早就发现各种专业才能对人的影响。如果你是一名象棋高手、一名医生、一名音乐大师，你就会有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似乎与此很相似，你会成为某一套世界观的专家，这会赋予你一套特殊的认知工具。所以我以为只要做一两个实验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非常有争议的，其中又包含了许许多多分支问题：头脑中的模块是彼此独立还是相互作用的？语法能够影响意义表征和知觉辨认吗？在某些理论中，头脑不同方面的相互作用是不可能的。另一些问题是先天和后天的对立。人的思想从何而来？思想在什么程度上是固有的、普世的、基于社会习俗的？人们对这些问题也存有巨大的分歧，而这种对立正是讨论语言能否塑造思维的关键。

还有一些问题是人类对语言的理解。人类处理语句、将声音转化为意义时，仅仅通过鼓膜感受到了空气的振动而已。从振动模式到语义内容，这一过程由哪些步骤构成？我们又理解到了什么样的语义？表层的形式结构会影响深层的语义结构吗？在语言塑造思维的观点中，表层结构能够影响人们对意义的构建、注意方向、编码方式和最终观点。这个问题的争议性达到令人难以置信，该领域的每一项发现都会引起激烈的讨论。

和科学界的其他大问题一样，“语言能否影响思维”不是一句“能”或者“不能”就能解决的。我的回答可能是，“语言可以通过某些机制影响思维，在某些案例中确实如此，在另一些案例中并不成立，而其中的原因需要进

一步解释”。最终，我们的研究目标是搞清楚头脑是如何运转的，人类为何能具有如此复杂的思维。

来自：果壳网

作者：Lera Boroditsky，斯坦福大学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心理学、神经科学

和象征系统。

■ 史苑钩沉

精神寻梦在北大：老北大边缘人的故事（四）

故事之十一：曾在北大旁听的大翻译家——曹靖华

曹靖华（1897—1987）我国著名翻译家、作家。河南卢氏人。原名联亚。1920年赴苏联留学。去苏留学前，曾与许钦文、柔石、胡也频等租住北大沙滩附近，在北大旁听，收获很大。北伐战争中，作翻译工作。1927年再次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大学等校任教。1933年回国后，任中国大学、北平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教授，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主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第一届副会长，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中国苏联文学研究会第一、二届名誉会长。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十年代初起，与鲁迅、瞿秋白共同致力于介绍俄国和苏联文学，译著宏富。长期从事教育与文学翻译及创作。著有《花》、《曹靖华散文选》，译有[苏]绥拉菲摩维奇《铁流》、《苏联作家七人集》等。

故事之十二：冯友兰回忆北大旁听生往事

冯友兰在《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的回忆文章中写到北大的旁听生的往事：“那个时候的北大，用一个褒义的名词说，是一个‘自由王国’，用一个贬义的名词说，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王国。蔡元培到北大以后，开课并不是先有一个预订的表，然后拉着教师去讲，而是让教师说出他们的研究题目，就把这个题目作为一门课。对于教师说，功课表真是活了。他所教的课，就是他的研究题目，他可以随时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实到课程的内容里去，也可以用在讲课时所发现的问题发展他的研究。讲课就是发表他的研究成果的机会，研究成果就直接充实了他的教学内容。这样，他讲起来就觉得心情舒畅，不以讲课为负担，学生听起来也觉得生动活泼，不以听课为负担。这样，就把研究和教学统一起来。说统一，还是多了两个字，其实它们本来就是一回事。开什么课，这是教师的自由，至于这个课怎么讲，

那更是他的自由了。学生们，那就更自由了。他可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上别系的课。你上什么课，不上什么课，没人管；你上课不上课也没人管。只到考试的时候你去参加就行。如果你不打算要毕业证书，不去参加考试也没人管。学校对于群众也是公开的。学校四门大开，上课铃一响，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到教室门口要一份讲义，进去坐下就听。发讲义的人，也不管你是谁，只要向他要，他就发，发完为止。有时应该上这门课的人，讲义没有拿到手，不应该上这门课的人倒先把讲义拿完了。当时有一种说法，说北大有三种学生，一种是正式学生，是经过入学考试进来的；一种是旁听生，虽然没有经过入学考试，可是办了旁听手续，得到许可的；还有一种是偷听生，既没有经过入学考试，也未办旁听手续，未经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有些人在北大附近租了房子，长期住下当偷听生。

故事之十三：作家鲁彦周在北大旁听鲁迅讲课

曾为北大旁听生的作家鲁彦周回忆他旁听鲁迅先生的课程时说：“每次每次，当鲁迅仰着冷静的苍白的面孔，走进北大的教室时，教室里两人一排的座位，总是挤坐着四五个人，连门边走道

都站满了校内的和校外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学生。教室里主着极大的喧闹。但当鲁迅先生一进门，立刻安静得只剩了呼吸的声音。他站在讲桌旁，用着锐利的目光望了一下听众，就开始了‘中国小说史’那一课题。”“他的身材并不高大，常穿一件黑色的短短的旧长袍，不常修理的粗长的头发下露出方正的前额和浓厚的耳朵。两条粗浓方长的眉毛平躺在高出的眉骨上，眼窝是下陷着的，眼角微朝下垂着，并不十分高大的鼻子给两边深刻的皱纹映衬着才显出一点高大的模样，浓密的上唇上的短须掩着他的阔的上唇这种种看不出来有什么奇特，既不威严也似乎不慈和。说起话来，声音是平缓的，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他那拿着粉笔和讲义的两手从来以没有表情的姿势帮着他的语言，他的脸上也老是那样的冷静，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着的。”“他叙述着极平常的中国小说史实，用着极平常的语言，既不赞誉，也不贬毁。”“然而教室里却突然爆发出笑声了。他的每句极平常的话，几乎都须被迫地停顿下来，中断下来。每个听众的眼前赤裸裸地显示出了美与丑，善与恶，真实与虚伪，光明与黑暗，过去、现在和未来。大家在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全人

类魂的历史，每一件事态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叠叠的外套，都有给他连根撕掉了。于是教室里的人全笑了起来，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渐与愤怒……”

故事之十五：曾在北大旁听的医学家——谢海洲

著名医学家谢海洲在解放前后曾在北大旁听，他在回忆文章《回顾我的大半生》中写到：“我出生在辽宁省绥中前所镇西门里，那是一个有几万人口的小镇。我记忆中我们家只有一个小药铺，平时不甚忙，每逢大集（每月三次，十日一集，各乡商贩，作买作卖，即今之农留市场）就在门口摆一药摊，同时在柜上坐堂看病，那是称祖父谢子厚当家的时代，我叔父比我大12岁，与我当时都是小徒弟。我祖父曾考过秀才，没有中举，即弃仕而从医，也曾教过童蒙，最终还是继其父志看病卖药。以后也逐渐传授中医学徒，他的徒弟几上毕业后，也为地方名医，如赵海亭、殷秀峰，不仅在当地，同时也在本县或邻县（临榆县）挂牌行医。别人称他‘名医出高徒’，但我祖父却说：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父。据我祖母讲，公公乃我曾祖父谢香圃，曾经王尔烈（清朝喜庆皇帝的老师，当时称其为压倒三江王尔烈）的介

绍，到北京为宫中看过病，并得到赏赐。我曾祖父出身儒家，不为良相而以良医为终生职业，并传承下来。他们父子是既治外科跌打损伤、痈疽疮疡，又看内、妇、儿科，同时还能打丹、熬膏药、配制丸散等。

我从小就在这样家庭熏陶下成长，于劳动中学习，既习文，又学医，既学医，又学药。方法很简单，完全靠死记硬背，背后再领会，日久潜移默化。我祖父是个老学究，家里有一些线装书，医书有三本，都是大部头的，一为《医宗金鉴》（自清至民国为民间医学教科书，官家以此为蓝本，做为考题之依据）。一为陈修园医学二十四种，陈为福建人，在北方为官，因此北方数省均喜读其书，因为陈的文学修养好，医学讲解，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便于记忆，所以书商也将别人的书，剽窃为陈氏之作，当时曾有陈修园四十八种（甚至还有七十二种）之多，可以说一半是伪作。另一本为《本草纲目》，记得我曾在1993年庆祝李时珍逝世400周年时在《中国中医药报》上为文论述《本草纲目》对我的影响。但我祖父教学生是从《医学心悟》教起，之后是陈修园著作，最后才读《医宗金鉴》。

及长，我有机会到北京入汇文中学读高中，由于受到师长的影响，我在诗书画以及为文（习作文章）上，下过一点功夫。同时对外语也不放过，因此至今仍能用英语作点简单的生活用语的交谈，这对我出国讲学减少了一些语言方面的障碍。

之后，我在燕京大学读了半年书，学校即停办了。我转学到北大，因为系别不合适，家庭经济拮据等原因，我没有更多的去上课。我曾从事过家教馆、写点报纸短文章、中学代课等，以后成为中药专家赵焯黄先生的私人助手及学生。我一方面又在北平市药学讲学所学习，同时还参加天津中医函授学校。跟赵先生时，为其查阅文献、志初稿、抄写文章、誉清稿子等，因此学到一些整理古文献的方法。解放后我曾去北大红楼旁听魏建功教授中国文献学的课，又在中华医学会所属的杂志充当兼职编辑，解答读者查询，向黄胜白老先生学习编辑与整理本草，使我积累了多方面的实践知识。

我在解放前后的市药科学学校、医士学校、护士学校、卫生学校教过书，市中医进修学校学习与工作。我晚上常跑北京图书馆看书写文章，给街坊邻里义务看病，这些都为成才打下了基础。

我现在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从事临床，同时也兼职教学，还办了一个中专职校，也不时的写些小文章，指导学生搞科研、写论文。我的读书范围很广，文史哲、现代涉猎。我主张中西医结合，我注重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虽身届古稀，便仍孜孜不倦，勤于学习，持之以恒地锻炼身体，能吃能睡，不生气，不着急，不紧张。我参加义诊，将有限的光阴贡献给一切公益事业。近年来我经常外出讲学及参加国际交流，特别注重对养生、食疗、老年病等研究，钻研疑难病的中医治疗，带好学生，积累临床经验，开展科研，总结规律。”

“我个人从‘文革’后‘复课闹革命’的七十年代开始，提出三大治疗法则，即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扶正培本，然后我顺此治则线索推演，在治疗痹、痿、癩、颅脑损伤后、中风及其后遗症等 40 余种疾病中取得一点成绩，我将这些内容心得体会写成药近 200 篇论文，我又在这些论文精炼编纂，写成《医药丛读》（中医古籍出版社，1990 年 4 月出版）；《谢海洲论医集》（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3 年 6 月出版），并参加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编写的《医话医论荟要》（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年 7 月出版），其中刊载我的医话医论 16 篇。

同时也不断看到一些编纂家，将我的论文收载汇编成册，那就不一一列举了。”

故事之十六：蔡元培亲自批准旁听生入学

北大老校友萧劳在《我在北大的几点回忆》谈到蔡元培帮他亲自批准他的老乡入学北大旁听的往事：“1917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即文学系）、正值蔡元培先生任校长，当时我的名字是萧禀原。蔡先生的办学宗旨是兼容并包，主导思想是提倡新学。他聘请了陈独秀先生担任文科长（即文学校长），聘请了周树人、钱玄同等新派人物担任教授，因而使北大面貌为之一新。那时我是一个学生，和蔡先生接触不多，但有件小事使我深深领略到了蔡先生的教育家风度。那年北大招收一批旁听生，我原来就读的河南省立二中有位姓杜的同学要求旁听，我去北大教务代为申请。教务处一位先生却说：‘座位满了，不能再收。’我说：‘座位没满，请你去教室

看看。’教务处的先生不去。我气呼呼地去见蔡校长。校长室在红楼二楼上，也没有秘书阻挡，学生可以随便去找。我一进门，蔡先生看我怒气冲冲，便和蔼地说：‘你先坐下，休息五分钟，五分钟后再再讲话。’我坐了一会儿，便和蔡先生说了为杜姓同学申请旁听的事。我说：‘多收一个学生总比少收一个好。教室有座位，可是教务处的先生却说座位满了。请校长去教室看看是否有座位？’蔡先生听后，马上亲自打电话把教务处那位先生请来。我当着蔡校长的面对教务处的先生说：‘教室确实还有座位，不信你去看。’教务处的先生没有说话。蔡校长当即拿笔写了一个条子‘准予杜××到中国文学门旁听’，交给教务处的先生。于是这位杜姓同学终于入学旁听了。”

作者：柳哲

来源：新华网

■ 大美北大

北大周边小胡同（下）

东面的胡同

从学校到位于校外的燕东园，要走东操场旁的小东门，经成府街和几条小胡同。我常到燕东园看望老师和拜访同事，故这条路也是经常走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记得东西向的成府街上有一家副食店和几家小杂货铺，成府街上有一座小桥，桥畔有一家理发铺。

成府地区虽比海淀镇小得多，但它的胡同也是纵横交错、颇为复杂的，这边有赵家胡同、蒋家胡同、薛家胡同、闻家胡同、刘家胡同、桑树园、枣树院、杨树胡同、柳树井……胡同竟然也有三十多条。有一次我到槐树街（成府的槐树街，非海淀镇的槐树街），在胡同里绕来绕去好半天也没有找到。

由于成府占有与海淀镇大致相同的有利地理位置，更兼位于清华与北大（解放前是燕京）之间，故也是藏龙卧虎之地。住在这里的有清廷建筑的承包商、清朝的遗老遗少，燕京大学的校长、教授……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成府

街上又出现了万圣书园和时髦的咖啡馆及茶馆。而上点年纪的人，则津津乐道于在解放前后开设在北大东校门外的小饭馆“长顺和”。这家小饭馆常被燕京和北大的老人简称为“长三”，那里的菜肴，如清炖鸡，味道好极了！

西面的胡同

北大西校门是北大的正门，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钉有门牌“簏斗桥一号”。

簏斗桥现已不复存在，原位于西校门和恩佑寺、恩慕寺庙门之间的马路上。在西校门的斜对面、蔚秀园的南侧，原有一条以簏斗桥命名的胡同。据侯仁之先生的考证，簏斗桥的原称应为“簏兜桥”，为海淀地区自明朝以来就有的最早地名之一。

挂甲屯是在北大西面最重要的一条胡同。它因彭德怀元帅 1959 至 1965 年期间生活在吴家花园——挂甲屯 20 号而遐迩闻名。那时，吴家花园的周围还有不少稻田。有一天，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回寝室后说，他在承泽园旁的稻田里看到了彭德怀元帅。为此，我曾故意绕

到那里的稻田好几次，却没有我的同学
那么幸运，始终没有碰到过彭老总。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奚小荻

学员心声

我的北大，我的梦

“考大学是农村孩子唯一的出路”这是所有人的想法，不知道多少人曾对我说过无数次遍，就像寺庙德尔钟声深深的烙在我的身体里，对我来说更是通往天国的路。

炎热的夏天，太阳像火球一样炙烤着大地和我们。抬头望，一座又一座的大山将我和我的村庄包围。从山底背着一捆小麦到山顶，再从山顶拉着一大车回家。山路上石子滚爬，尘土足有三尺深，鞋子到裤子全被泥土覆盖，衣服只有灰颜色，浑身不自在。这四轮的木质车子是爷爷传给父亲的，如今父亲老了，将它又传给了哥哥。生活在这里，我很庆幸自己是女孩子，山头那几亩田地不会分给我。

我喜欢看电视剧，喜欢里面的人和他们的生活，喜欢站在公路旁看来往的人群，羡慕城市的故事。但我也不会沉迷在那里，终究不现实。只有考上大学才能真正脱离这里，县上考大学的几率很小，村里十多年才出一两个大学生，看着他们拉着黑色的皮箱，轻轻的飘过

我的身旁，带着茉莉花的香味，注目着那离去的身影，那是天国来的女孩吗，是电视里的城里人吗？每每想到这，我就飞奔回家开始学习。

北方的寒冬是冰的世界，趴在冰冷的课桌上，手硬邦邦的，吹一口热气于手心，又再次投入高考复习中。清早朦朦胧胧，踏着迷雾进入教室，夜幕来临，迎着星空回宿舍。一天又一天，这样的日子早已成为习惯，我从未又过怨言，一切都只为考大学，只有考上大学才能实现期待已久的梦想。

那年高一，一位北大的教授来校演讲。我静静地坐在下面，望着台上那高大的身影，像神一般严肃，他对我来说遥不可及。他走时说：“我在北大等你们”。北大，神话的世界，而我当时就想考上一所普通的大学就心满意足了。高考钟声定锤。那一刻，所有的希望都灰飞烟灭了。大学注定我与它无缘。背起行李踏上南方的打工之路。

工厂里机器声轰隆响着，车间里流水线一道又一道工序永不停歇，蓝色的

工衣蓝色的帽子，我们没有姓名不分性别，被称为“F10……F70。”电批、电锤与我们相依为命，它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深深扎入我的灵魂底部，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整个人都麻木了，没有思想没有梦想，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不清楚。

偶然的一次机会，听说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开始招生了，我疯狂了，像失去翅膀的鸟儿重回蓝天，我激动的落泪了，还有机会，是的，还有机会上大学。北大，对我来说多么神圣的学府，如此不可触摸的地方。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急促的爬上十二层高楼，望着

黑夜，望着川流不息的车辆，对着我眼前这座繁华的城市大声呐喊“北大，我来了，我终于实现我的梦想了。”那瞬间，全身都在沸腾，血液在滚滚流淌，伸手可触摸到星空，那是一条通往天国的路，爱做梦的女孩，她做梦也想不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我选择了社会工作专业，人活着要有意义的活着，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专业，可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让他们的更好的活着，也让我的人生变得有价值。

作者：张英

广州圆梦计划 2013 秋